总第61期
2020年01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邓小平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重大贡献

论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共同特性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快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一心向党经风云——百岁女红军黄海云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正谱调研指导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

王正谱与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班子成员和处室负责同志座谈。

王正谱在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座谈会上讲话。

王正谱深入省委党史研究室各处室调研指导。

4月13日下午，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正谱来到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指导，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党史工作，积极融入全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好方向、担好职责、用好资源、带好队伍，切实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不断开创全省党史工作新局面。

王正谱首先走访了省委党史研究室各处室，详细询问每个处室的工作情况，亲切慰问干部职工，随后与领导班子成员和处室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座谈会上，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晓晨全面汇报了近几年来全省党史工作情况，领导班子成员作了补充发言。王正谱充分肯定省委党史研究室近年来的工作，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易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干部三处负责同志，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省委党史研究室 办公室 宣教处）

立场问题事关我们对事物的根本看法，党史研究把好方向的核心是讲政治。要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研究好、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工作系列重要论述落实到行动中、贯彻到工作各个环节；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纪律，在爱党护党的具体实践中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增强斗争精神，站稳政治立场，严把党史审读的政治关史实关，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旗帜鲜明同一切错误言论作斗争。

党史工作要把准工作定位，研究党史部门的特点、优势和发展规律，并随着时间发展不断深化；要体现地域特色，下沉工作着力点，跟进做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施“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等大事要事的收集整理工作，记录好、研究好新时代四川正在发生的历史；要加强内部融合，强化处（室）之间的沟通交流，探讨研究收获，互相启发借鉴；要善于借助外力，发挥党史部门的综合协调、统筹组织作用，调动外部研究力量的积极性，形成研究合力和整体优势。

四川党史资源十分丰富，是一片充满红色印记的革命热土，一定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要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党史挖掘研究，讲好四川红色故事，把党史资源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抓好党史宣传教育，让党史进机关、进社区、进网络，用红色文化浸润人、激励人；要积极参与长征干部学院建设，加强在课程开发、史料挖掘、讲解规范等方面的指导支持，共同把省委部署的这件大事办好。

机构改革后，党史部门职能有了很大变化，承担的任务更繁重，省委的要求更高。要建强领导班子、优化结构，多渠道选拔对党史工作有兴趣、有意愿的同志充实进入党史干部队伍；要树立正确导向，严管厚爱结合，健全成果评价和人员激励机制，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对于不良苗头要及时制止、敢于斗争；要用好党史学会这个平台，加快培养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名家大家和青年人才，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党史人才队伍，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正谱在调研指导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2020年01期
/总第61期

主管主办：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名誉顾问：
谢世杰　秦玉琴　陶武先　席义方

顾　问：
王承先　陈荣仲　吴得民　卢耸岗
赵庆东　罗宗荣　张继禄　彭亚新
龚自德　王庭科　彭穗宁　王光华
侯德邻　张国新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晓晨

副主任：
江红英　郭生春

委　员：
周锐京　严仕兵　戴忠东　谢海彬
范　斌　王　皓　曾　新　陈　东
牟　飞　邱　俊　李思源　余正道
唐广生　文　漳　申福建　罗兴林
李　勇　侯立新　陈良云　罗之聪
师　伟　李树伦　李卫东　肖　飞
阿　莲　陈卫红

封　面：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内雕塑

封　二：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正谱
调研指导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

封　三：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晓晨一行
赴广安市开展驻村帮扶走访慰问及党史工作调研

封　底：
雅康高速公路大渡河特大桥

卷首语

01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正谱在调研指导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学习园地

04　在70集系列片《四川记忆》研讨会上的讲话
/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刘晓晨

07　为奋进四川铭心 为伟大时代立传
——在70集系列专题片《四川印记》作品研讨会上的讲话（摘选）
/ 四川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杨颖

专题研究

10　邓小平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重大贡献
/ 彭俊才　李　正

15　川北民军起义：共产党人组织策划的四川最早反抗军阀的武装起义
/ 张玮苇　欧天鹏　魏海军　龚鑫

21　论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共同特性
/ 宋键

口述历史

27　党的民族政策在凉山大放光彩
——党的民族政策在凉山的实践回顾
/ 阿什老轨（口述）

工作交流

31　注重扶志扶智相结合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对脱贫攻坚关键年的思考
/ 陈静

人物春秋

34　一心向党经风云
——百岁女红军黄海云
/ 王友平

资政新篇

40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快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 江红颖

壮丽70年

43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四川印记》(四)

动态窗口

47　省委党史研究室抓实抓细全方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70集系列专题片《四川印记》作品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遂宁党史资政报告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充分肯定和批示

内江市委书记马波对《从抗击非典到抗击新冠的内江实践》作出肯定性批示

绵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岳勇看望慰问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职工

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刊名题签：何应辉

《四川党史》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范　斌
编辑部副主任：蒲志明　马　睿
编　　辑：王　强
美术编辑：《廉政瞭望》杂志社

-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商业后街3号
- 邮编：610031
- 电话：028-86603910
- 电子邮箱：scds.2007@163.com
- 网址：www.scds.org.cn
-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 印刷单位：四川川林印刷有限公司
- 印刷日期：2020年03月
- 印数：2000册
- 发送对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各省(区、市)党史工作部门，全省各级党史工作部门，省级各机关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扫码关注 四川党史

在70集系列片《四川记忆》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刘晓晨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作为党史、新中国历史的直接记录者、研究者、传播者，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按照省委清华书记策划一批重大项目宣传新中国70年四川发展成就的批示精神，与相关单位精诚合作，庚即谋划实施了“七个一”献礼工程，即：出版发行一本书《新中国70年四川大事记》，策划制作播放一部70集文献系列片《辉煌70年·四川印记》，制作展播一档35集音频节目《四川革命烈士诗文选析》，撰写报送一系列关于新中国70年四川发展的资政专报，全力完成四川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相关任务和第一展厅展陈工作，组织召开“邓小平与新中国”“朱德与新中国”“三线建设与新中国”等一系列理论研讨会和一个座谈会“四川省党史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献礼工程取得历史性突破，在全社会掀起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热潮。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推出的70集系列片《四川印记》，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一、《四川印记》是四川党史学界的一次合作共赢，受到社会广泛认可

70集系列片《四川印记》主题鲜明、立意高远、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既有浓烈的历史厚重感，又有鲜明的现实时代感。透过《四川印记》的一段段声音、一幅幅画面，人们在凝练的文字和珍贵的影像中走近历史，看到四川壮丽70年里一个个重要历史时刻，也能在党史研究和相关方面专家的评述中，了解到每一个大事件对四川发展的深远影响，并在这些不朽的历史瞬间中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涌动出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激荡起只争朝夕的奋斗豪情。该片现已在四川电视台《四川新闻》栏目、学习强国APP等八大平台全部播完，获得了省内外、海内外广大观众网友的一致好评，是四川党史学界的一次先行尝试。

一是省委领导高度关注。作为迄今为止对四川70年发展历程中的70件大事最具全景式、权威性梳理总结的媒体作品，该片展现了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历届四川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攻坚克难、开拓奋进，推进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恢宏历史篇章。省委领导高度关注。按照省委领导要求，我们向省委常委办提供了专题片的全部文稿；在省委主办的四川省庆祝新中国70周年成就展现场，专题片进行了集中展播。

二是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在全国党史系统宣教培训会上，专题片《四川印记》的创作被魏海生副院长点名作经验交流，在全国党史研究系统微信群中转发，引起热议；四川省社科界众多专家学者和各界群众都纷纷来电表示《四川印记》通过盘点巴蜀跨越巨变的节点性事件，切中巴蜀发展的关键，力求由点到线、由线及面铺陈展开，让观众通过珍贵的影像资料走近历史，生动丰富地展现新中国70年四川的辉煌巨变。

三是各级媒体推送转播。70集系列片《四川印记》制作精良，全景式展现了新中国70年四川人民风雨兼程、筚路蓝缕的奋进历程，该片去年

7月至12月，在《四川新闻》栏目和《四川观察》客户端同步推出。同时，还同步分发到了新浪微博、今日头条、腾讯视频、百度APP等多个平台。节目发布后引发了收视热潮，截至目前，《四川印记》全网的点击量已破千万。

四是职能部门充分认可。国家广电总局在8月21日第160期《监管日报》上点评到，“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印记》以每集2-3分钟的篇幅，梳理四川70年70个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响和专家评述，生动展现四川70年巨变，带领观众走进历史、展望未来”。今年9月，在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网络视听优秀节目评选中，节目的代表作《四川印记3：成渝铁路通车》还荣获了专业组优秀作品奖。

二、《四川印记》是智库与媒体合作的一次成功探索，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四川印记》70集系列专题节目凝聚了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广播电视台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心血，从文稿撰写到资料视频的拍摄，从专家采访到后期包装，《四川印记》精雕细琢、精心制作，是省委党史研究智库机构和四川省级主流媒体发挥各自优势、深度合作的一次成功探索。总结起来我们有这样的体会：

一是必须坚持鲜明正确的主题立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两家单位立足本职，主动担当作为。在该片创作过程中，创作团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牢记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四川指示批示精神，省委、省政府各个时期的决策精神，将之融汇贯穿于节目创作全流程，落实到每一集节目的谋篇布局之中，落实到每一个细节的电视表达之中。

二是必须培育勤奋敬业的创作团队。接到创作任务后，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广播电视台高度重视，室领导、台领导多次研究部署，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抽调精干力量，搭建创作班子，以最专业的队伍、最有力的保障，确保专题片创作顺利推进。创作团队夙夜在公，全身心投入节目创作。为了让“高大上”的政治专题片入耳、入眼、入心，吸引最大规模的观众群体，节目创作坚持创新表现形式，注重情感化、故事化表达，力争做到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让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从资料库中“活”起来，勾起众多观众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对每个历史事件和历史瞬间进行信息延展和精辟解读，把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串珠成链，让人能从中深刻感知时代变迁，清晰洞察发展脉络，充分汲取奋进力量，体现出以珍贵影像生动记录历史、以专家解读彰显思想深度、以全网分发强化融合传播等特色。

三是必须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支持。珍贵影像中的历史时刻对四川的今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每一个大事件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执政理念和发展逻辑？《四川印记》每一集都在片尾处引入了“专家观点”，邀请四川党史专家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省民委、省农业农村厅、省国资委、省文旅厅等多个省级部门负责人和相关业界学者针对该集的历史事件进行点评和解读。在《四川印记》中，众多专家学者纷纷以深刻的见解和精辟的评述，聚焦一系列巴蜀大事件背后的重大意义，分析其深远影响，为观众深入浅出地解读四川壮丽70年的奋斗“基因”和发展“密码”，做到了见人见事见思想，让《四川印记》在事实之外更有观点和态度，有效增强了节目的深度。

三、《四川印记》是建党100周年献礼工程的一次探路先行，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随着2021年建党100周年举国大庆日子的临近，我们在认真总结分析《四川印记》成功经验同时，盼望各位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各媒体单位的朋友能给我们好的建议，拓展思维，为推出高质量、有影响的党史研究成果，策划一批重大党史宣教项目，形成对建党100年来四川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的权威的历史记述，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学理支撑，为资政育人、服务四川经济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向建党100周年隆重献礼。

一是党史研究成果如何更好对接主流媒体需求，切入主流媒体平台，发挥资政育人重要独特作用？中央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制度化、长期化，学党史用党史必将常态化。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开门办史”“开放办史”，主动推动党史进网络、进媒体，还需进一步努力。

二是党史宣教工作如何在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中，对接服务中心大局，贴近融入相关工作，积极作出应有贡献？建党100年是“两个100年”之首，是100年中共党史最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之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届时必将围绕辉煌党史开展各类活动，党史部门理所当然应该主动作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三是建议宣传部门、广电部门等相关部门可否社科项目评奖、“小正大”节目评选等做法，统筹探索设立重大宣教活动专项引导资金。出台相关制度，形成工作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活动或项目给予补贴、奖励等支持，以此破解相关方面开展宣教活动资金瓶颈难题，激发各方面开展宣教活动的积极性创造性。

为奋进四川铭心　为伟大时代立传
——在70集系列专题片《四川印记》作品研讨会上的讲话（摘选）

四川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杨颖

唐代杜牧诗云："凯歌应是新年唱，便逐春风浩浩声。"新中国70年峥嵘岁月，巴蜀大地沧桑巨变，有很多记忆值得珍藏，有很多故事令人难忘。由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四川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播出的70集系列专题片《四川印记》，穿越70年历史，用光影与峥嵘岁月深情拥抱，在影像中与巴蜀儿女的集体记忆欣然相逢。

一、政治站位、家国情怀是打造精品的首要前提

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伟大的时代需要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是新闻宣传战线不变的初心和使命。面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大主题，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四川广播电视台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本着对党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发挥各自优势，精诚合作，共同推出70集系列专题片《四川印记》，播出后反响良好，得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表扬肯定。回顾《四川印记》的制作过程，可以概括出以下三点经验启示。

首先，"烹小鲜"当"观大势"。《四川印记》70件大事勾勒出的历史脉络，不仅是四川的集体记忆，也是共和国的铿锵步伐，不仅是四川故事，更是中国声音。通过对70年大事的筛选梳理，我们感到，只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既"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也"蹲在田埂上找感觉"，作品才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既有份量，又有温度。事实上，这70集系列节目，每一集都是既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又在本土本地找准落脚点，这也是我们做好重大主题报道的一个基本经验。

其次，"讲大爱"需"共小情"。70年辉煌历程，饱含着一代代人的奋斗，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四川印记》选取的每一件大事、铺陈的每一幅画面，配上的每一句解说，都能勾起众多观众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整个节目把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串珠成链，以情感连接点激发感染力，在"共情共鸣共振"中体现思想力量、展示人文精神、彰显家国情怀。这种贴近人心的表达，更能让人们从中深刻感知时代变迁、清晰洞察发展脉络、充分汲取奋进力量，体现出了思想、温度和品质。

再次，"知兴替"必"读旧史"。《四川印记》既有历史眼光，又有现实视野。它向我们展示的是重大主题报道尤其是历史成就性宣传报道的思路：即从大主题出发，在小切口上用力，处理好旧与新、大与小、远与近等一系列辩证关系，它不仅仅是回顾过去，更是立足当下，以视频的手段讲述历史、昭示未来，从"旧闻"里看"新知"，在融合中显价值。

二、工匠精神、严谨作风是打造精品的重要保障

我以为：匠心映初心，作品见作风。为做好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大主题宣传，作为党史研究职能部门和省级主流媒体，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深入交流，找到了共同书写答

卷的契合点，用70集系列专题片定格四川70个冬夏春秋，用70个重大历史事件勾连巴蜀70载辉煌画卷。从春天开始策划制作到盛夏陆续刊播，从70件大事的梳理到反复斟酌几易其稿，从每一集文稿初成到后期审片打磨，从多平台推送播出到今天组织专家点评研讨总结。一载辛苦忙碌的成就，是《四川印记》“见人见事见思想，有理有情有深度”的标签；一载春华秋实的背后，是精益求精专业精神和严谨务实工作作风的展现。面对时代给出的题目，我们交出了这份凝聚着双方的智慧和心血、体现着共同的责任与担当的答卷。至于会评分几何？就让我们以最谦逊、最真诚的姿态，迎接观众和网友的品评，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三、优势互补、精诚协作是打造精品的必要手段

常言道：“独木难支，孤掌难鸣。”“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在《四川印记》创作过程中，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文稿，四川广播电视台负责视频制作和全媒体融合传播，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成就了“1+1＞2”的传播效果。

文稿方面，省委党史研究室用70个重大事件串联起70年历史，涵盖四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标志性强、意义重大，既是对四川党史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勾起了一代代四川人的集体记忆。

视频制作方面，我们深刻把握媒体传播规律和受众收视习惯的变化，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方向，那就是通过厚重历史的轻量化视频解读，让观众在珍贵影像中与70年集体记忆相逢，让人感到亲切、唤起回忆、引发共鸣。

在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方面，我们坚持“移动优先、融合传播”，先小屏、后大屏，以《四川观察》客户端和《四川新闻》电视栏目为端口，联动学习强国APP等八大平台立体传播，形成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传播格局。

表达历史的关键在于真实，当时的影像或者老照片是难得的佐证。四川广播电视台在台媒资库中广泛搜集、精心挑选，让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从资料库中“活”起来，让观众通过珍贵的影像资料和老照片走近历史，触摸四川奋进和发展的脉搏，这不仅让《四川印记》成为了记录天府历史的影像志，也让厚重的主题表达更加直观和鲜活生动，大大提升了感染力。

正如宋代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中所言：“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虽然川台拥有较为丰富的音视频媒资库，但由于1978年才正式建台，在此之前相对比较久远的历史事件，视频和图片资料还是有所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幸省委党史研究室及时从旁协助、积极主动作为，多方搜集资料图片。双方优势互补、精诚协作，打开了工作困局、推进了工作进展。

四、守正创新、融合贯通是打造精品的有力支撑

有道是：“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出新者进。”当下媒体传播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从“纸与笔”“铅与火”到“光与电”“数与网”，信息传播技术的变革，带来了一个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的全媒体时代。新闻宣传工作要做到与时俱进，必须坚持以守正促创新、以创新强守正，在融合中发展、在发展中融合。70集系列专题片《四川印记》的成功，为我们积累宝贵的经验，也为我们做好建党100周年宣传报道提供很好的借鉴。我们希望在今后的重大主题报道上，与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各界有更加密切的协作，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为此，我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适时启动建党100周年宣传报道合作项目，做到提早谋划、提前部署。今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政党，风华正茂。做好这一主题的宣传报道，是双方共同的责任和担当。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收集资料、筹备选题、策划宣传内容和呈现形式。比如，可考虑策划推出100集系列短视频《党史上的四川》，或者制作系列专题片《巴山蜀水党旗

红》、或者依托新媒体平台共同推出《党史小课堂》动画及互动答题活动等。要坚持内容为王、创意先行，提前谋划。特别是文稿的整理和相关素材资料的收集，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和广泛的来源，呈现的效果应该会更好。

其次，加强沟通交流，在日常工作中拓展更多合作空间。近年来，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全省大力推进党史“七进+”工作和党史教育基地建设工作，成绩斐然。但我觉得宣传报道的力度还不够。机关、社区、农村、学校、企业、军营、网络，党史“七进”的地方也是新闻宣传工作长期关注的地方，完全可以共同收集筛选选题，通过故事化、场景化的视频表达，展示党史教育工作在促进基层思想理论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成果。而一大批党史教育基地，本身也是我们长期关注报道的对象。从这些方面来看，双方合作空间广泛。

第三，强化互联网思维，用科技为宣传赋能。在5G时代，视频将是媒体产品的最主要表现形态，在不同场景、不同终端能实现随时随地上传、传播和收看。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视频特别是短视频以及直播方面的优势，写好媒体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同时，我们愿继续加强与各相关职能部门、智库机构的合作，以更大的成绩，为奋进四川铭心，为伟大时代立传。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新年贺词里勉励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万众一心加油干”。1月3号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要求“扎实做好各项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坚定主心骨、汇聚正能量、振奋精气神”，我们将坚守初心使命、践行责任担当，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汇聚各方面力量，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最后，通过一首《七律·四川印记》，与诸位共勉：

七秩江山奔眼底，五千华夏尽缤纷。
源头活水声声慢，枝上黄莺处处闻。
百载栉风多沐雨，四川展翅好凌云。
初心未改情依旧，舜地尧天迥不群。

注：七秩，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百载，指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邓小平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重大贡献

彭俊才 李正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把中国铁路建设作为经济建设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领导修筑成渝铁路，开中国建设之先；指导成昆铁路建设，开创世界伟大创举；重视北京地铁建设，建好中国第一条战备地下铁道；整顿铁道秩序，保障铁路建设、运营健康发展。为中国铁路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领筑成渝铁路 开中国建之先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邓小平生长在四川广安，深知四川人民渴望修筑铁路，改变蜀道难的状况。成渝铁路的筹建，从1906年开始，一直喧嚷了40余年，经过清王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建成。

1949年，邓小平在接到中央进军大西南命令后，就开始谋划修筑成渝铁路。他在上海结识了陈毅的堂兄兵工专家陈修和先生，便委托陈修和物色一批建设人才到四川来修筑成渝铁路。12月31日，四川刚解放不久，时任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在主持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上决定：“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不但可以帮助四川恢复经济，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1950年1月，邓小平在向党中央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修建成渝铁路，并呈述了三点：第一，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达；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计划很快得到党中央批准，下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资助修路。

1950年3月，在西南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的领导下，重庆成立西南铁路工程局，实施线路勘测、设计。随后，在西南军区首批调集4000名解放军指战员奔赴工地。按照邓小平的领导部署，西南军区各部队总共抽调了3万多人，组成5个修建成渝铁路的军工筑路队。

6月15日，盛大隆重的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重庆浮图关下西南军区操场举行。邓小平亲临开工典礼，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做起。”“我们今天订出修路计划，开始兴工，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真正的困难是在开工之后才能发现。”朝鲜战争爆发后，修筑成渝铁路的工兵部队大都参加抗美援朝。他们留下的任务，为重庆、四川各城镇招募的失业工人和沿线动员的农村民工所接替。这样，数以十万计的民工分散在千里成渝线上修筑铁路。

成渝铁路于1950年8月1日，由重庆101厂（今重庆钢铁公司）开始铺轨，年底到达江津；1951年“七一”通车到永川；1952年6月13日到达成都。7月1日，重庆和成都两市同时举行了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典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党中央领导人纷纷题词祝贺。邓小平出席了在重庆

举行的通车庆典，他还邀请了许多四川耆宿，如熊克武、但懋辛、刘文辉等人参加。请他们亲眼目睹共产党人为实现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愿望的办事效率。在庆典上，邓小平同志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刊发在《新华日报》上。

成渝铁路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全长505公里，共有车站60个。它横穿四川盆地，沿线物产富饶，有力地促进西南地区物资流通，对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建设起着重要作用。成渝铁路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用自己生产的钢轨和枕木建设的铁路。更为难得的，竟是在解放初期，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建成的，这无疑是一个奇迹。在中外铁路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①]

指导成昆铁路 开创世界创举

成昆铁路于1958年7月开始动工修建，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在1964年大会战前曾经三次上马三次下马。邓小平无论是领导铁路建设，或是主持中央工作，始终亲临指导成昆铁路建设。

1952年8月，邓小平调任中央人民政府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开始负责分管中国铁路建设。为衔接已建成的成渝铁路和在建的宝成铁路，打通中国南部对外通道，中央政府开始研究成都至昆明铁路线路走向，邓小平亲自参与了研究。

195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当年，在邓小平领导下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成立，实施修建成昆铁路项目。经过选线专家们的徒步踏勘和地质研究，成昆铁路工程形成西线、中线和东线三大线路走向方案。经审查后确定为西线，由成都经峨眉、普雄、西昌、金江、龙街至昆明。1958年7月，成昆铁路成都至峨眉段全面动工建设。1959年4月，受当时中国国内经济下滑、粮食短缺影响，成昆铁路除成都至沙湾段以及沙湾以南重点隧道工程维持施工外，其余路段工程下马停工。

1961年初，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由邓小平直接抓铁路整顿工作。5月，成昆铁路项目再次上马建设，后又因故下马停工。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三线建设与西南铁路建设的战略决策。”9月5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作出指示：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方支持小组，要什么给什么。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落实小组。遵照邓小平指示，9月成立了中国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下设工地指挥部、技术委员会和支援铁路修建委员会，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成昆铁路建设大会战，汇聚数十万筑路大军重新建设成昆铁路。原中国铁道兵第1、8、10师及中铁二局先后进入施工管区，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其中，中铁二局16个工程处、16.8万人上成昆铁路，担负成都至峨眉沙湾段和金口河至礼州段建设任务。铁路穿越大小凉山断层，跨金沙江水泊，越横断山脉，山高谷深，不良地质广泛发育，被称为“地质博物馆”。1965年初，国务院10个部委的5万多职工从全国各地汇集攀枝花；中央军委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参加成昆铁路大会战。

成渝铁路

1965年11月1日至12月7日，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开展三线建设（包括铁路建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等一行赴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省视察指导三线建设（成昆铁路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建设项目）。邓小平等一行由时任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陪同，乘火车专列来到乐山，视察指导三线建设和成昆铁路峨边、金口河等车站施工建设。关村坝一线天工地，中铁二局创造了装填炸药388吨，一次爆炸成功的壮举；建成了跨54米，迄今为止我国跨度最大的“一线天”铁路石拱桥；打通了沙木拉打、关村坝两座6000米以上、当时国内最长的隧道。看到系着保险索的拼装工人正在将最后的钢梁吊起，灵巧地将大桥两边的半拱跨连成一个整体；目睹一道“长虹”在两山间升起，邓小平笑容满面，频频点头称赞：“人民创造了历史！”后邓小平一行在关村坝隧道内观看了隧道开挖，沿川黔线考察了凉风垭隧道和乌江大桥等工程，还特地来到贵昆铁路铺轨最前方的关寨地区，视察了关寨三线隧道和关寨大桥的桥梁架设。在铁路建设指挥部领导的请求下，邓小平欣然挥笔题写了“关寨站”站名。

11月24日，邓小平一行到重点工程贵阳火车站视察指导。吕正操仔细向邓小平汇报了火车站扩建的工程情况。邓小平听后指出：很好！决定了就干，要抓紧建设，不要打打停停，浪费人力及物资。在安顺视察时，听取了铁道兵副司令郭维城汇报后，邓小平询问了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编制和施工情况。郭维城和基建工程兵一一作了汇报，并陪邓小平接见了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女通讯战士。当天邓小平在视察六盘水时指出：“云南要搞铁路建设，铁路建设标准要高些。”他还具体指示：“成昆铁路按年1300万吨设计，内昆铁路按年800万吨运力设计。”12月2日， 邓小平一行在攀枝花招待所会议室认真听取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攀枝花特区党委书记徐驰对攀枝花基地模型沙盘的详细讲解，和市委市政府、成昆铁路指挥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指出：“攀钢何时投产，六盘水何时供煤，成昆线何时通车，何时供应多少煤和铁路承担多大运量，三家都要制定和执行相互配合的时间表。”为成昆铁路建成和营运作了重要安排部署。

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通车，北起四川省成都市，南到云南省昆明市，北接宝成、成渝铁路，南连贵昆、昆河铁路，并与昆阳等铁路支线相连，全长1100公里。修建隧道427座、桥梁991座，全线122个车站中有41个设在桥梁上或隧道内。成昆铁路的建成对促进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与带动作用。成昆铁路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三线建设”的重大成果之一。成昆铁路的修建成功，开创了世界铁路建设的伟大创举，被联合国认定为：人类20世纪创造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杰作之一。[②]

重视北京地铁 建好中国第一条

196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决定重新启动修建北京地下铁道，时任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非常重视北京地铁的建设。他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审查设计、施工方案，确定了地铁修建的三项原则：“交通服从战备，地上服从地下，时间服从质量”。

7月1日，以“适应军事需要，兼顾城市交通”为修建方针，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举行隆重的开工典礼。邓小平和朱德、彭真、李先念、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典礼，并挥锹动土，为北京地铁建设奠基。同时，他们还视察了地铁建设工地和生活区，并与参加地铁建设施工的干部、工人和铁道兵指战员亲切交谈。邓小平对地铁建设设计、施工还作了重要的具体指示：车站要朴素大方、坚固适用、不要豪华。为体现邓小平这一指示，北京地铁车站装修主要运用吊顶、灯具形式的多样化、变换柱形和饰面的材料、颜色及重点装饰等艺术处理手法，以达到朴素大方又具有我国建筑风格的效果。

1969年10月，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线路建成，从北京火车站起，西至苹果园，全长23.6公里，17个车站。但此时地铁属于战备工程，并未投入公共

运营，主要用于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参观。1971年1月15日开始运营。

1974年6月，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第二次亲临地铁一期工程考察，乘坐了一线地铁列车。当了解到地铁车辆的个别设备器件不是标准产品时，邓小平高度重视，当即指示：要进行技术改造，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根据邓小平指示，北京地铁领导机关，认真组织抓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安全制度，全面整治车辆设备器件质量改造的工作，迅速改变了车辆设备个别器件落后的面貌，使北京中国第一条地铁达到了按质、按时满足运营的需要。[③]

整顿铁路秩序 确保健康发展

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铁路系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制”“八规”等合理规章制度受到破坏；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湘黔、成昆等重点工程相继停工；群众运动代替了科学管理，企业管理混乱，浪费损失严重；一味拼设备、吃老本、浮夸假报非常严重。1960年，兰州、呼和浩特、哈尔滨三个铁路局瘫痪了两个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61年初，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由邓小平直接抓铁路整顿工作。1月24日，邓小平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各位领导听取了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武竞天的汇报。邓小平指示：铁道部要成立政治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月27日，铁道部在北京召开全路领导干部会议。邓小平接见了部分代表并讲了话。他尖锐地指出：铁路上浮夸风是严重的，根源是主观主义，不实事求是，头脑发热，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瞎指挥，强迫命令，逼着下面说假话，一级糊弄一级，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还强调：现在铁路运输秩序不好，主要原因是把原有的规章制度破坏了，却没有建立新的规章制度，或者立错了。迷信要破除，但不能违反科学。一锤定音指出：这次会议中心是整章建制，整顿运行秩序。

会议连续开了12天，限期恢复和建立三项基本制度和八项规程。会后，铁道部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开展了铁路建设、运行秩序全面整顿，铁道部迅即成立党委、政治部，健全基层政治工作组织，加强生产第一线的党、团工作，和生产第一线职工思想教育。建立健全了三项基本制度和八项规程，在全路开展安全正点“四爱”（爱车、爱路、爱货、爱设备）立功运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全国铁路系统整顿初见成效。客车出发正点率达到98%，运行正点率达到90.1%；货车出发正点率达到88.7%，运行正点率达到84.2%，提前实现了“双九双八”的目标。1962年，客货列车始发，运行正点率都保持在90%以上，行车重大、大事故比上年减少55%。铁路运行、安全情况有了明显好转。[④]

1974年，由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国民经济严重滑坡。全国铁路全年比上一年少运货物4321吨，货运量下降了5.3%，新建铁路投资减少3.9%，铺轨里程减少21.5%；铁路工业生产总值减少了2.4亿元，发生行车事故755件。面对严峻的形势，1975年初，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职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全面整顿经济，选择铁路作为突破口。2月中旬，邓小平召集谷牧、万里等人座谈整顿问题。他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特点是“高、大、半”（高度集中，大动脉，半军事化管理），所以整顿经济必须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并提出整顿内容与要求。并要求铁道部马上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文件。3月5日，中央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指出：“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根据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中央出台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在铁路整顿中邓小平选择了从整顿徐州铁路局开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徐州铁路运输最为重要；第二，徐州铁路局派性问题最为严重；第三，对徐州铁路整顿的共识度最高。着重抓两条线（陇海、浙

邓小平乘坐新干线。

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太原）。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遵照邓小平指示和中央9号文件决定，先后在徐州等地，对问题严重的铁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集中解决领导班子问题，限期改正；到期不改，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果断的组织措施，重新配备领导班子。法办33个煽动闹派性、武斗、停工停产的坏人。经过整顿，全国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到4月份，严重堵塞区段先后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日均装车达到5.37万辆，比2月份增加上万辆，为历史最好水平。部属32个铁路工厂，31个超额完成计划，初步实现了铁道部在整顿开始时提出的目标：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突出”（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两个不适应”（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做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确保全国铁路建设、运行健康发展。[5]

1978年秋天，邓小平在日本考察，他在乘坐高速铁路感慨地说：“像风一样快，我们现在很需要跑！”这是一代伟人对中国铁路加速发展的期盼，更是对国家腾飞的期盼。当时，国外的高速列车时速已达300公里以上，而我国铁路旅客列车的平均旅行时速只有43公里。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期盼和激励下，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我国从2008年迈进了高铁时代，到2018年，中国高铁发展迅速，被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高铁营业里程达到2.9万公里，超世界高铁总里程2/3。如今，中国高铁已经实现了建成和在建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快、运载人数最多、动车组谱系最全等多个世界之“最”。中国动车组“复兴号”开通运行，实现了350公里的全球商业运营高铁最高时速，开创了惊艳世界的“中国速度”。总设计师邓小平，领筑、指导、重视、期盼和激励中国铁路建设，使中国铁路建设实现了由“追赶者”到“引领者”转变，为中国铁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四川省广安市档案馆）

参考文献

①《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设决策出炉记》？重庆日报2019—07—01
②《邓小平在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前前后后》宋毅军著，《党史文苑》，2014年08期
③ 中共北京市委：邓小平同志对北京市的关怀和激励2004-07-25 新华网
④ 邓小平实录。2主编：李新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2018年9月。
⑤《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程中原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14年8月。

川北民军起义：共产党人组织策划的四川最早反抗军阀的武装起义

张玮苇 欧天鹏 魏海军 龚鑫

广安是四川省革命思想传播早、党组织建立早和力量较强大的地区之一，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就在岳池县组织策划了以抗粮、抗捐、抗税，反对反动军阀统治为主要目标的川北民军起义。以熊尧蓂、刘汉民、廖玉璧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抓住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的有利时机，及时果断地组织民众，团结争取进步人士，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川北民军起义，成为共产党人组织策划的四川最早反抗军阀的武装起义，比泸顺起义还早了6个月。

川北民军负责人廖玉璧

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尖锐的社会矛盾

（一）防区制下人民沉重的捐税负担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四川进入军阀混战时期，除熊克武部外，“四川各路军队演变成了新军阀，大小军阀以防区为界，各霸一方，营造起自己的独立王国。”[①]地处四川东部华蓥山脉中段的岳池县，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主产水稻，是军阀争夺的目标。1916年，川滇黔靖国联军石青阳部驻防岳池；1918年，熊克武部江防司令余际唐攻打岳池，赶走石青阳部；1920年，邓锡侯部师长黄隐赶走余际唐部；1921年，川军师长郑启和赶走黄隐部；1923年，陕军司令张藩率部赶走郑启和，不久，张藩又被川陕边防军李家钰部张遂良旅赶走；1924年川军罗泽洲部赶走张遂良旅，派旅长刘瑞文进驻岳池。[②]至1925年8月，除武胜外，广安、岳池、邻水三县基本由罗泽洲部占据。[③]

军阀混战期间，各路军阀为争夺地盘，无限制扩充军队，既而大肆搜刮民财，以供军需和中饱私囊。驻军在防区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自任官吏，自出政策，巧立名目，强行摊派各种捐税。1924年罗泽洲部进驻岳池后，随粮征收“友军协饷”、“保甲经费”、“建设费”、“开发费”、“团甲办公费”、“临时军饷”等苛捐杂税。其工商各税从1913年的2类26种，到1927年增至4类78种。[④]如果再加上地方杂派，负担更为苛重。沉重的捐税负担不但使广大贫苦农民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就连一些中小地主、一些有一定地位的“头面人物”也难以支撑。加之当时岳池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1926年，岳池已预征田赋到1930年，并附加二成税收，半年内勒捐百万元，起义前夕又增加清

乡捐13万元[5]，人民“财尽力穷，无法出纳”[6]，成为川北民军起义的导火索。

（二）全国范围内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和中共重庆地委的成立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的历史，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局面的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1925年5月，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席卷全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北伐战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相互支持，把全国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

1925年秋，杨闇公等积极筹备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1926年1月，杨闇公、童庸生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二大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批准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7]。1926年3月，四川省级党组织——中共重庆地委正式成立[8]。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全川各地党、团组织统归其领导，四川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军事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得到了快速发展。

（三）岳池共产党人掌握武装力量

1924年底，熊尧蓂[9]赴任岳池邮政局长。他以岳池邮政局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举办“平民学校”，在县城进步教师、青年、学生、邮政职工中传阅《唯物史观》、《中国青年》、《向导》等马克思主义刊物，宣传革命思想。1925年秋，熊尧蓂经童庸生[10]介绍由团转党。10月1日，重庆团地委书记杨闇公写信指示熊尧蓂举办平民学校，培养积极分子，壮大革命力量。

川军第五师何光烈部炮兵营营长刘汉民[11]常从驻防的南充回家省亲，其间结识了共产党员熊尧蓂等。1925年冬，熊尧蓂秘密发展刘汉民为党员。入党后，刘汉民离开军阀部队，回到岳池开展革命活动。

1925年五卅惨案后，在南京上大学的廖玉璧[12]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东南大学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在南京组织和发动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廖玉璧在游行中受伤，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岳池县，开展党的活动，熊尧蓂接转了他的党组织关系。

当时，以熊尧蓂、刘汉民、廖玉璧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经看到了反动军阀与人民群众之间矛盾的激化。为了反抗军阀罗泽洲的横征暴敛，拯救生活困苦、无力缴纳巨额苛捐杂税的人民群众，当时力量较弱、人数较少的岳池共产党人把争取和联合地方势力，直接和间接掌握武装放在革命工作的重要位置，以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勇敢走上武装反抗地

中共岳池特支成立地——岳池邮政局。

方军阀的道路，揭开了广安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熊尧蓂曾在自传中指出："四十八场的抗粮抗税[13]是我们同志领导策动的"[14]。

1926年初，根据商议决定，由刘汉民负责军运，廖玉璧负责农运，积极发动农民群众抗粮、抗捐、抗税，为开展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反军阀武装斗争做好先期准备。

廖玉璧掌握部分民团武装。为了加快武装力量的组建，1925年，廖玉璧利用其与当时岳池县长任正格的师生关系，打入县政府。10月，任正格委任廖玉璧为资马乡十二场（现岳池县中和、罗渡和华蓥市所辖河东七场、河西五场）民团大队长兼黎梓卫（现中和镇）团总。他吸收大量贫苦农民到民团，掌握了部分武装，为后来川北民军的建立积蓄了力量。

刘汉民联合岳池县团练局长陈徙南。陈徙南[15]早年参加同盟会，常主持公道，打抱不平，在地方上有很大号召力。他因抵制和反对驻军罗泽洲部的横征暴敛，而被排斥和打击[16]。陈徙南还是廖玉璧爱人陈联诗的堂叔，廖玉璧夫妇的革命活动也得到了陈徙南的大力帮助。经岳池共产党人派人与陈徙南联系，陈同意合作反对军阀。此后，刘汉民多次与陈徙南秘密研究，决定抓住军阀罗泽洲搞预征粮的超经济剥削、人民不堪忍受自发反抗的时机，组织各乡民团武装反抗。陈徙南派人与邻水、广安、合川、武胜等地民团武装联系，准备对罗泽洲的驻军及防地发动进攻。1926年5月6日，陈徙南主持召开岳池团务会议，决定将县团练局机关迁至资马乡驻营。团练局迁出县城，脱离军阀监控，方便了联系与指挥[17]。

屈元亮率部准备参加川北民军。在军阀何光烈部的共产党员屈元亮于1926年初，率所辖部队400余人脱离军阀统治，驻入岳池、武胜、合川3县交界的义和、乐善、双星、余家、太平、肖家、飞龙七场，准备参加川北民军。对此，罗泽洲视为心腹大患。1926年4月，罗泽洲纠集岳池、武胜、合川三县反动武装，向屈元亮部发动全线进攻。屈元亮对此早有防备，率部奋力反击，激战数天，打退敌人的联合进攻，使三县武装损失惨重[18]。

联合绿林武装。反动军阀的横征暴敛不仅将大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逼上揭竿而起占山为王的反抗之路，甚至将一些地方上有一定财产、有一定地位的人也整得无法生存而变成"响马"[19]。这些绿林好汉，与军阀誓不两立，只要晓以大义，因势利导，是很有可能加入到反军阀的队伍里来的。曾任岳池县油榨溪（现镇裕镇）团总的龚贯一和曾任岳池县高等小学教师的王道纯率领的绿林武装就是如此。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岳池共产党人通过与其交往甚密的地方进步人士使2人带领队伍投入到反军阀的革命队伍中来，共同反抗军阀。

二、奋起反抗：川北民军起义

（一）四十八场民团联席会议：川北民军成立

在共产党人的促成下，陈徙南与附近各场民团团总联系，于1926年5月19日[20]，在黎梓卫关帝庙内召开了四十八场民团联席会议（实际到会二十余乡民团团总）。熊尧蓂（中共党员）、刘汉民（中共党员）、廖玉璧（中共党员）、屈元亮（中共党员）、王道纯、黎梓卫镇长肖汉全、高兴团总吴剑峰、阳和团总贺渊泉、伏龙团总张宗德、广安明月团总李洪举，还有中和龙泉一团团政何炳德、二团团政蒋炳光，中和孝义二团团政谭九成以及乡绅邓白光（中和哥老会义字号大爷）、段礼云等80余人参会。经过商议，决定由屈元亮、龚贯一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各乡民团联合组成"川北民军"1000余人[21]，推举陈徙南为司令，刘汉民为党代表，廖玉璧负责军务[22]，以抗粮、抗捐、抗税，驱逐军阀、实行地方自治为口号。

会后，陈徙南、刘汉民、屈元亮在黎梓卫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具体研究攻打军阀罗泽洲的实施方针和战斗方案，并决定将指挥机关设在苏台寺。为了把驱逐军阀的口号变成各乡民团的自觉行动，陈徙南、刘汉民派团丁郭太坤、夏成良等到各地张贴历数军阀罗泽洲在岳池罪恶统治的布告，并通知各乡民团行动。郭太坤在县城张贴布告时，被军阀捉

住枪杀于南校场。[23]

（二）起义爆发：攻打岳池县城

1926年6月21日，龚贯一率领所属部队在西板乡河堰口，拦截罗泽洲部属刘瑞文派往遂宁向军阀李家钰领取的由一个连押运的枪弹，龚贯一部当场打死负责押运的易兴胜和敌兵杨连长，随后又打死不肯交枪弹的士兵数人，缴获了全部枪弹，为攻打岳池县城提供了武器准备[24]。6月22日，龚贯一率领所属部队500余人向岳池县城南、北两门同时发起攻势，刘瑞文所属驻军紧闭城门，不敢迎战。刘瑞文一面急电广安罗泽洲师部求援，一面拿重金收买士兵组成敢死队，上城墙守护。龚贯一率部猛攻不克，双方战斗胶着对峙。城外民军战士不断高喊：活捉大烟灰（罗泽洲），绞死二烟灰（罗瀛洲）。6月27日上午，罗瀛洲率一个团从街上抄捷径赶到南门，刚一开门伸出头来，便挨了民军一枪。守城士兵见罗瀛洲受伤，军心大乱，个别士兵退下城墙。龚贯一乘机率部抢攻南门。恰在这时，敌军马团长率部赶到南门，对龚贯一部形成夹攻之势。经过半天的激战，龚部伤亡惨重，被俘30余人。为保存实力，龚贯一率部血战突围，之后率领200多人向西板方向撤退。罗瀛洲将30余名被俘民军施用酷刑后全部杀害。

（三）惨遭镇压：天宝寨阻击战

6月26日，陈徙南、刘汉民率领400余名民军从中和出发，奔赴岳池增援龚贯一部，因联系不便，驻地分散，致使增援行动迟缓。第二天赶到石垭场，得到同盟会员石廉泉的军需物资支援。但因石垭场团总周本立迟迟不肯出兵，又闻龚贯一部被罗军击败撤退，遂率部返回。军阀罗泽洲令刘瑞文全旅尾随“追剿”。民军进到赛龙场时，与军阀部队相遇，全部被围，幸得顺梁寨民团刘少云率部参战，牵制了刘瑞文兵力。陈徙南、刘汉民乘势率部突围，抢渡渠河，退至中和天宝寨，凭险迎战刘瑞文部，激战三天三夜。多次打退刘瑞文部进攻，给敌人以重创，刘瑞文部死伤100余人，民军还缴获敌人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25]刘瑞文急电罗泽洲增调炮兵攻寨。民军因寡不敌众，弹药粮食缺少，只得奋战突围。主力一部撤至合川李家老寨子固守，并在此休整3个多月，廖玉璧率领另一部200多人仍留在阳和、高兴华蓥山一带，与刘瑞文迂回作战三个多月。

（四）隐蔽转移：大溪沟会议

1926年11月，陈徙南、刘汉民、屈元亮、王道纯等在华蓥山大溪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形势，最后大家一致决定转移：陈徙南前往重庆，争取与刘湘共谋出兵攻打罗泽洲；屈元亮部暂到长寿范绍增部栖身；刘汉民率领一批骨干转移蓬溪东乡一带；王道纯在广安、岳池交界的岳门铺一带继续筹集武装力量；龚贯一部仍在南充、岳池、武胜边境的嘉陵江两岸广大地区与罗泽洲周旋。[26]

三、川北民军起义的影响及失败原因

川北民军起义后，罗泽洲撤销了刘瑞文的职务，缓征资马十二乡捐税。重庆军阀刘存厚、刘湘也受到震慑，纷纷改变策略，严防民变。[27]

川北民军起义从1926年6月开始，至11月部队隐蔽转移，历时5个月，参加起义1000余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规模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沉重打击了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起义唤醒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为后来党组织在华蓥山领导武装斗争培养了刘汉民、廖玉璧、屈元亮、王道纯（1930年入党）等一批党的骨干，播下了革命的火种。[28]

川北民军起义坚持了半年左右最终失败，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年轻的共产党人缺乏组织领导武装起义的经验。大革命时期，广安党组织还处于创建阶段，共产党人首次组织策划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缺乏经验。虽然川北民军参加者达1000余人，但是组织协调不够，力量分散，在

增援迟缓的情况下被敌军各个击破。在攻打岳池县城时，龚贯一部打了攻坚战，但其他民军行动迟缓、贻误战机，有些还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致使罗泽洲能在防区内迅速调集兵力，集中“围剿”龚部。第二、反革命势力相对强大和革命力量相对弱小，尤其是在封建军阀势力强大的四川农村。第三、民团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民团主要由当地农民组成，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军阀割据、强取豪夺深感不满，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另一方面，民团根植于封建经济，革命不可能彻底，从而导致部分民团团总不按计划行事，贻误战机。第四、人民并未充分发动起来，没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导致起义队伍难以坚持下去。

川北民军起义虽然是共产党人组织策划的武装起义，但是是以军团冲突为表现形式，这一点是不能回避的，而起义的局限性及最终失败也与此密切关联。

四、川北民军起义是共产党人组织策划的四川最早反抗军阀的武装起义

川北民军与军阀罗泽洲之间的斗争，是共产党人组织策划和参与的一场大规模反对军阀统治的武装斗争。光辉的历史，总是蕴含着不朽的历史精神。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人如刘汉民、屈元亮、廖玉璧等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精于谋划、不怕牺牲，充分发挥了党员的骨干作用，是共产党人组织策划的四川最早反抗军阀的武装起义。

川北民军起义是共产党人组织策划的起义。大革命时期，四川共产党组织还处于初建阶段。共产党员人数不多，力量弱小，一旦亮出革命旗帜，会被反动军阀大力剿灭。因此，岳池共产党人主要是秘密开展组织策划工作，包括联合老同盟会员陈徙南，安排廖玉璧打入地方政府内部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秘密发展军阀何光烈部刘汉民、屈元亮为共产党员，争取绿林武装支持等。通过陈徙南的社会名望和在民团中的影响力，号召岳池全县乃至周边民团团结起来，联合地下党员武装以及对军阀心怀不满的绿林武装共同发动武装起义。川北民军攻打岳池县城，在当时的岳池及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普通群众和军阀不了解内情，认为是军阀与当地民团之间的武装冲突，导致大量历史文献中称此次起义为“军团冲突”。但“岳池军团冲突”并不能准确表述这次事件的性质，更不能将其与同时期的“安岳军团冲突”[29]相提并论。川北民军起义与安岳军团冲突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其有共产党人的组织策划。

川北民军起义也是共产党人参与的起义。四十八场民团联席会议中不乏共产党员熊尧蓂、刘汉民、廖玉璧、屈元亮等的身影，刘汉民在川北民军中担任党代表，廖玉璧负责军务。廖玉璧、屈元亮带领的队伍也是川北民军的中坚力量。起义过程中，以刘汉民、廖玉璧、屈元亮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更是不畏牺牲，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殊死搏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充分发挥了党员的骨干作用。

川北民军起义是四川最早反对军阀的武装起义。大革命时期，随着防区制下四川人民与军阀之间矛盾的激化，四川境内抗粮、抗捐、抗税的农民武装斗争并不是个案。除了1926年6月川北民军起义，还有1927年1月，涪陵共产党员李蔚如率农军6000余人围攻南川县城。2月，中共荣县特支领导民团武装抗捐，宜宾党组织负责人郑佑之率农民武装2000余人前往支援，会合后成立川南农民自卫军指挥部。3月，川西郫县爆发了农民自卫军抗捐事件，武装围城48天。4月，在共产党员石兆祥的领导下，高桥农会组织蒲江、眉山、彭山、邛崃、名山等县32个乡镇近万农民开展打土豪、抗捐抗粮斗争。这些中共领导组织的声势浩大的农村武装斗争配合和策应了1926年12月爆发的泸顺起义。[30]据已查证的资料看，川北民军起义是共产党人组织策划的四川最早反抗军阀的武装起义。

（作者单位：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①张继禄主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四川省岳池县志编纂委员会：《岳池县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③中共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安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④《中国共产党广安历史（第一卷）》，第4页。

⑤中共岳池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岳池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⑥《中国共产党岳池历史（第一卷）》，第27页。

⑦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⑧《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第64页。

⑨1906年生，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人。

⑩熊尧蓂的中学国文老师，中共党员，曾任重庆团地委书记。

⑪又名刘渊、刘铁，1901年1月生，岳池县九龙镇人。

⑫又名扶农、永年、简文，1903年2月生，岳池县黎梓卫（现中和镇）人。

⑬即川北民军起义，由于起义前夕召开了四十八场民团联席会议，故有此说。

⑭熊尧蓂：《熊尧蓂自传——革命活动主要经历》（1951年），岳池县史志办：17-C14。

⑮1884年生，岳池县罗渡人。

⑯《岳池县志》，第422页。

⑰《中国共产党岳池历史（第一卷）》，第20-21页。

⑱武胜县史志办公室委著：《中国共产党武胜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⑲强盗。因其多是骑马行劫，并先放响箭，故称响马。

⑳《中国共产党广安历史（第一卷）》，第26页。关于四十八场民团联席会议召开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26年5月19日，一说是1926年5月13日。《中国共产党岳池历史（第一卷）》使用的是1926年5月13日（农历四月初八），笔者查了万年历，1926年5月13日不是农历四月初八，而是四月初二，5月19日才是四月初八，阳历和农历明显不一致；《岳池县志》中则是在不同的章节分别采用了5月19日、5月13日两种说法；由于阿拉伯数字在过去手写中容易出错，农历较为准确，加之《中国共产党广安历史（第一卷）》使用的是5月19日，笔者采用了5月19日的说法。

㉑雷又宣：《对廖玉璧聚集两百余人在阳河富龙打了一仗的调查——二六年军团冲突情况》（1983年9月6日），岳池县史志办：1285-A112。

㉒《岳池县志》，第563页。

㉓《中国共产党岳池历史（第一卷）》，第27页。

㉔田井济：《田井济谈二六年军团冲突》（1985年6月30日），岳池县史志办：1384-A112。

㉕《中国共产党岳池历史（第一卷）》，第27页。

㉖《中国共产党岳池历史（第一卷）》，第28-29页。

㉗《中国共产党岳池历史（第一卷）》，第29页。

㉘1931年，中共岳池特支安排刘汉民、廖玉璧、王道纯等组建华蓥山游击队，开展反抗军阀杨森的武装斗争。1948年华蓥山周边更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联合武装起义，沉重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㉙1925年5月，安岳县人民反对军阀李家钰师进驻安岳，并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安岳民团负责人李崇光支持这一斗争。为此，安岳民团与李部发生军事摩擦，被迫退到白鹤场。团内江组织为了支持安岳人民的斗争，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谢独开（时任内江南区民团大队长）与荣昌吴家铺的陈子虞组织内江、富顺民团队伍3000余人，配合安岳民团，分驻安岳、内江、富顺的交通要道上，构成“三县联团”。“三县联团”威逼李部撤出安岳，退回遂宁。（《中共内江市中区历史（1926-1949）》，内江党史方志网，http：//www.njdsfzw.gov.cn/ds_show.asp？id=6）

㉚宋键：《论泸顺起义的独特历史地位》，四川党史文献网，http：//www.scds.org.cn/2018-1/26/745-6046-302.htm，2018年1月26日。

论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共同特性

宋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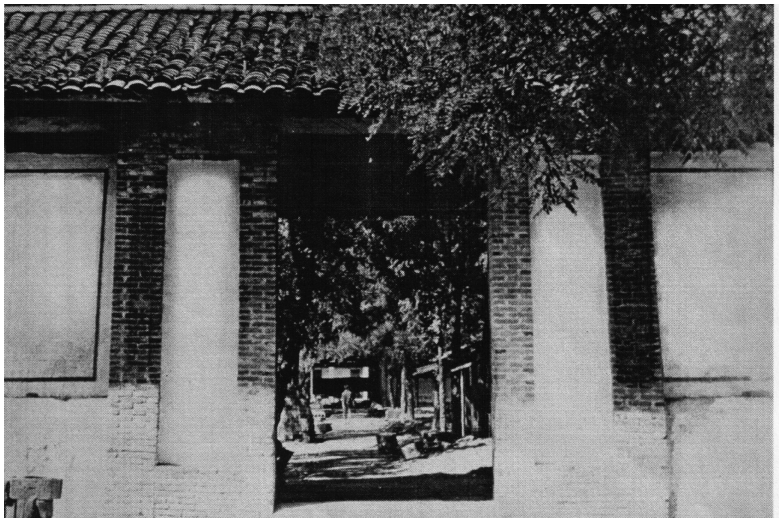
川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和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典型实践，在中国革命事业中有着各自独特的地位。二者在进行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践过程中，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相同，社会环境相似，因此呈现出一些共同特性。深化两个根据地政权建设共同特性的研究，对总结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条件下的执政经验、深化中国苏维埃运动规律的认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两个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对武装斗争都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力量。川陕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都是在军事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体现出对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高度依赖性。

川陕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维持的28个月里，有近20个月都是在战争状态下存在的。川陕苏区军民先后进行了反三路围攻、三次进攻战役、反六路围攻、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等。因此整个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始终是围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展开的一系列武装斗争，这就使得苏区政权建设具有十分明显的战时特性，不少县级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随着战事情形和根据地阵线收缩而时存时续。1933年8月8日，在通江新场坝召开的100多名干部参加的地方武装代表会议上，中共川陕省委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陕省军区指挥部，由张广才任指挥长，同时还组织与会代表对西北军区政治部制定的《川陕省军区指挥部组织条例（草案）》和《西北军区赤卫军条例（草案）》进行了讨论和学习。为适应战争环境，大会决定在各县苏维埃设立县军区指挥部，以领导和指挥该辖区内的赤卫军、游击队、独立营、战斗连等群众性武装组织。各级苏维埃政权最大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应对维持接连不断的反“围剿”战争而产生的扩红、征粮、生产等问题，即一切都是为了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由此可见，川陕苏区的政权建设是一刻也离不开武装斗争的开展和革命战争的胜利。

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先后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发动的三次军事“围剿”，建立的红色政权也几经反复。1934年2月，国民党调集1万多人的兵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率领陕甘边红26军主力，主动撤离寺村塬，转入外线，纵横驰骋于陕甘边的广大地区，残酷的战争使根据地三易活动中心，从甘肃正宁寺村塬到陕西耀县照金，再到甘肃庆阳南梁，由于军事力量的薄弱，虽采用游击战术最终粉碎了国民党军阀组织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呈现连片统一之势，但在正宁建立的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和耀县建立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两个临时政权不得不先后停滞，根据地丧失，只得易地再建。1935年初，国民党蒋介石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星火燎原之势深感不安，再次调集4万大军对陕



川陕省军区指挥部遗址。

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妄图迅速扑灭西北地区燃起的革命烈火。此时陕甘边根据地经过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采用红色（发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白色（派共产党员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土匪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储备武装力量）三种斗争方式来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后红军力量逐步壮大起来，通过采用红26军骑兵团、第一团及数10支地方武装，坚持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斗争，牵制南线和西线敌军的行动；而红26军第3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陕北红27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横扫西北战场敌军，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相继攻占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一举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使陕甘边和陕北完全连成一片，形成了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强有力的革命武装捍卫确保了南梁的陕甘边苏维埃政权巍然屹立。1935年8月，蒋介石害怕会师后的一、四方面军向陕北集中，迫不及待地调集10万大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西北军委前敌指挥部采取集中兵力，利用敌军矛盾，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战定仙塢，歼敌2000余人，打垮了东线敌军的攻势；再战劳山，歼敌3700余人。10月，又在榆林桥歼灭国民党一〇七师大部，使蒋介石企图在长征红军到达陕甘苏区之前剿灭西北红军的美梦化为泡影。正是得益于一系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从而为“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提供了最根本的军事保障。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①]川陕和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对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高度依赖性，是毛泽东同志这一著名论断的实践运用，同时也为这一论断增添了两个生动例证。

二、两个根据地的政权对民主政治建设都进行了宝贵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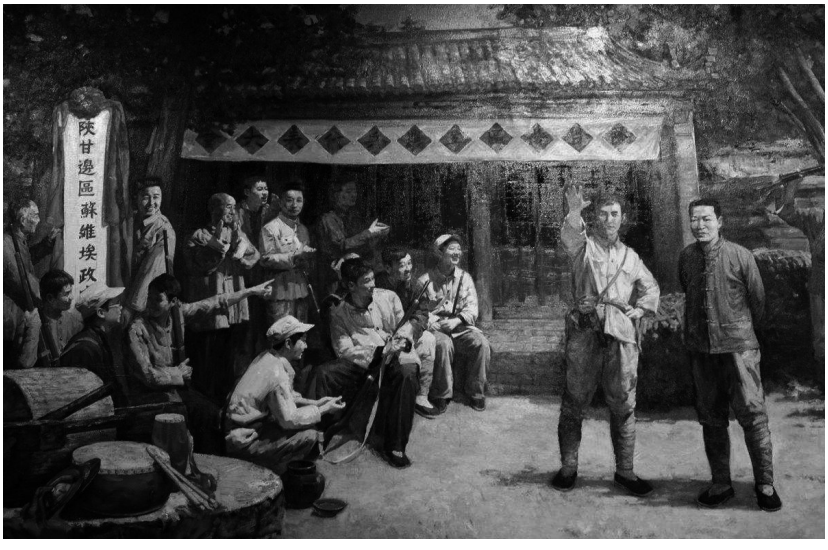
川陕和陕甘边根据地政权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意思是采用一种“会议”或“代表会议”形式组织的政权，核心内涵是广泛的以工农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政权组织形式，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情况下的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宝贵的探索。

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是通过民主选举建政和施政的。川陕省苏维埃总共召开了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1933年2月17日，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召开，到会代表150余人，大会讨论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1933年8月，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大会在巴中召开，到会代表1160人，选举了由23人组成的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熊国炳任主席。会议决定各县代表会后立即召开县、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各乡、村工农群众大会，建立和健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根据《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村苏维埃由全村群众大会直接选举，乡苏维埃由全乡群众大会或村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同时强调川陕省各级苏维埃政权属于全川陕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群众，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1934年12月11日，川陕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巴中召开，到会代表1440人，选举产生了27人组成的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任主席，余洪远、祝义亭任副主席。

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对民主的探索更多是体现在对各级政权的民主监督上。中共川陕省委极其重视对各级苏维埃政权的民主监督。对政府和权力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是确保政权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根本保障，也是政府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让人民群众实现当家做主的最根本体现。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川陕根据地主要通过以下三条途径来实现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民主监督。一是建立党对各级苏维埃的巡视制度，加强党对苏维埃的监督。通过此举，把下级苏维埃政权的各项工作置于上级党委和苏维埃政府的有力监督之下，实行上级对下级的行政监督与管理。1933年8月，川陕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省工农监察委员会，并决定建立省对各级苏维埃的巡视制度。通过建立巡视制度，既密切了苏维埃上下级之间的工作联系，便于上级对下级的指导，也基本抑制了苏维埃机关内的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同时也保证了党对苏维埃运动的绝对领导。二是通过“十家代表”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和批评苏维埃的工作。在川陕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过程中，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十家代表”的设立并认真发挥其实行民主、联系群众方面的作用。根据《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十家代表”不仅要执行村苏维埃所安排的各项工作，同时还具有将村苏维埃完成工作任务、工作人员履职尽责的各种情况向上级报告的权利。“十家代表”制的推行，不仅广泛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积极性，使苏维埃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更密切的联系，而且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切实发扬了民主，实现了人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有效监督。三是加强工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对苏维埃的民主监督。1934年10月，周纯全在《中共川陕省委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总结》中指出：“工会贫农团是川陕苏维埃的支柱，有监督苏维埃和改造苏维埃的权利。”[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苏维埃政府在施政中，特别是土地分配过程中滥用权力、违法违纪和贫污腐化的现象发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各个时期的红色政权也都是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正宁寺村塬时期，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就是选举诞生的。1932年4月初，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新庄子召开群众大会，由每个村推选出代表1人，共70余人，其中贫农40余名，雇农10余名，中农20余名，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选出15名委员组成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游击队政委李杰夫任主席，张静元等任副主席。代表的产生是按照地区人数比例选举产生，兼顾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种出身成分，具体是雇农5人选一名代表，贫农10人选一名代表，中农20人选一名代表，地主、富农则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按不同人口比例选举产生代表的做法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人民代表的选举所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鉴。在耀县照金时期，照金革命委员会也是民主选举产生。1933年4月5日，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照金革命委员会，贫农代表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下设经济委员、粮食委员、文化教育委员、土地委员、肃反委员及赤卫军总指挥部等人员和机构。在庆阳南梁时期，陕甘边第一个正式的苏维埃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同样如此。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100多名代表是从陕甘边区贫苦农民、工人、游击队、赤卫队和红26军中选举产生的。与会代表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推举出自己满意的候选人，最后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习仲勋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刘志丹任军委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通过民主选举建立红色政权仅仅是陕甘边区政权建设对民主探索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劳苦大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采用全民普选代表的方式唤醒了陕甘边区民众的民主意识，大大激起了他们的参与政权建设的意愿。所建立的苏维埃政府通过实施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制度，广泛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政权并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既保证了政府能集思广益制定各项政策法令，使之符合边区实际情况，也让积极参与其中的根据地人民衷心拥护党领导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对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为后来陕甘宁边区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川陕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都是单一制结构，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均由下至上逐级通过广大的工农兵大众民主选举产生，将立法、行政、监督各项权力高度统一，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代表制构成了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对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进行了宝贵的探索。

三、两个根据地政权都十分注重法规制度建设

在川陕和陕甘边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两个根据地都非常注重法规制度建设，从而使政权建设从一开始就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权的法规制度建设卓有成效。在川陕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法规、制度、条例。1933年2月，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和《苏维埃组织法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概要说明》，对川陕根据地政权的性质、任务、政权结构和政权体制、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以及政府各部门的职权、职责等都作了详细、具体而十分明确的规定，奠定了川陕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法理基础。之后，川陕省苏维埃又遵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总体原则，相继制定颁布《粮食条例》《禁戒鸦片条例》《交通条例》《苏维埃工作方式条例》《肃反条例》《保卫局条例》《革命法庭条例》《自首条例》《没收条例》《戒严条例》《经济公社、合作社条例》《银行条例》《商业条例》《医务条例》、发行工作条例》等行政法规、民法和刑法，对各项工作的开展进行进一步规范。川陕根据地还特别强调廉政建设，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运用多种形式加强各级政府干部的党性、革命性、人民性等政治思想教育，极力提倡廉洁奉公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从而使川陕根据地绝大多数干部都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形成了不讲条件、不讲待遇、不讲享受、不贪污腐化、不多占多吞、不行贿受贿、不徇私舞弊的苏区干部好作风。二是从制度上对各级干部的工作、生活待遇、是否脱产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使各级干部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个人待遇均有章可循。三是对违反廉政制度的干部实行严处。凡“私拿苏维埃的东西回家”、“浪费苏维埃的经济和银钱过手不清的”、“只顾多拿钱不认真办工作”之类的干部坚决“取消他们的工作”，用铁的纪律对各级干部进行教育与约束。[③]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巴中娱楼和学田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照金革命委员会时期就颁布了各种法令，包括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还到处贴出各项布告：戒烟、禁赌、除奸、剪发、放足、破除迷信等。群众读到这些法令和布告时，切实体会到革命政权确实是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的，从而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主张。到南梁苏维埃政权时期，陕甘边代表大会除了选举出政府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外，还讨论通过了《土地决议案》《政治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军事决议案》等一系列重要法规法令。其中《土地决议案》就是根据1930年中央苏区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土地法》制定的，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土地委员会的领导下，广大劳苦大众按法令分到了土地、牛羊、粮食和其他生产资料，从而使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得以迅速有序开展起来。针对陕甘边区地处偏僻山区，存在诸多沿袭封建社会的陋习恶俗如买卖婚姻、缠足、赌博、迷信、吸食鸦片等，陕甘边苏维埃政权专门成立了各种委员会，制定颁布了禁烟条例、禁毒条例、放脚条例以及反对买卖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法规，同时要求人们严格遵守法令法规，开创了根据地朝气蓬勃的崭新局面，揭开了西北边区移风易俗和社会建设的序幕。

四、两个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具有同样的历史局限性

川陕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建立和存续时间不尽相同，各自政权建设的制度、措施均各有侧重和特色，但毕竟都是在战争环境下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勇敢尝试，受当时中共中央“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两者在政府机构设置、干部素质等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是政权结构和机构设置上的诸多局限。两个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机构设置都存在机构庞大、交叉重叠、职能混乱的问题。如川陕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机构庞大，省苏维埃政府2000余人（含各委员会、保卫局等），各委员会主席、各部处主要负责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本部有多少干部和多少工作人员。各县苏维埃政府，也不下300人（保卫局部队和犯人未计在内）。区政府有数十人，乡有十余人，村也有七八人，这样庞大的机构，人员之多，经费开支又无预、决算，只能靠各级机关用

打土豪的方式解决，土豪打完了，则只有取之于民。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机构重叠。如保卫局、裁判委员会和革命法庭的设置，保卫局、革命法庭都是审犯人、关犯人，结果裁判委员会无工作做了；有交通委员会却又设立了一个运输司令部，由政府领导，与交通委员会对立起来；财政委员会和红军供给部混在一起，一切经费均供军队（当时条件所限），但却又忽略了苏区的财政建设和巩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虽然成立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但职能定位较为模糊，人员大都是红军指战员和当地民众的积极分子，一旦战事发生，这些干部全部调去直接参战或做备战工作，苏维埃政府往往处于停顿状态，日常工作根本无法正常推进。战事结束后，战斗减员造成的各级政权中干部变动性较大，也非常影响工作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其次是干部素质上，普遍存在着政府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偏低，难以胜任自己工作的现象。两个根据地各级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大都是红军作战取得胜利后所建立，政府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农民，不少还一字不识。在“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苏维埃政权一定要把握在工农手中”的口号倡导下，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了不少贫农、雇农、工人出身的同志来领导机关工作，这些同志没有受过教育，工作能力不强。例如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1933年1月才入党，2月即被选举为省苏维埃主席，不识字；副主席祝义亭，曾是一名邮差，一字不识，最初在县委当司务长，后被选举为省苏维埃副主席，兼任交通委员会主席、赤色邮局局长；陕甘边苏维埃政权里除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蔡子伟等少数干部文化程度较高外，其他内务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工农监察委员会的众多干部，大抵是识字不多的农民。这些人的本质都很好，但确实因能力不够而完全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加上两个根据地都受中共六大的“唯成分论”干部政策的影响，使根据地基本上形成了从省府到各级基层政府都是工农群众出身的干部体制。这些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贫苦农民，“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也闻所未闻，更不要说什么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④]。不可否认，这些工农干部身上有着许多非常突出的优点，如勤俭、质朴、节约、忠诚等，但他们文化层次极低，大多数属于文盲，加上大部分未经历过大革命风暴的锻炼和洗礼，其本身的素质和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让他们未经任何政治训练，立即担任各级政府的要职，这就给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和困难。例如川陕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的主席向思爵，当时年仅十六七岁，仅因读过两年书，曾在县里做过儿童团的工作，就调来担任省苏文委主席，结果一遇到工作不会开展，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也手足无措。虽然后来两个根据地都致力于加强干部教育，但起点太低，很大程度上还保留在识字脱盲阶段，使得两个根据地的各级政府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工作效率低、工作秩序紊乱、工作理不清头绪等弊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局限了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在西南和西北的典型实践，川陕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存在着很多共同的特性，如红色政权对党领导军事斗争的高度依赖性，都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对局部执政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宝贵的探索，都十分注重制度法规建设，同时也因所处的历史时代相同、所处社会环境相似而存在着相同的历史局限性。

（作者单位：四川省直机关党校）

参考文献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②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四川大学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③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四川大学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

④ 《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

党的民族政策在凉山大放光彩

——党的民族政策在凉山的实践回顾

阿什老轨（口述）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还是国家脱贫攻坚重点帮扶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之一。凉山的发展历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在凉山的贯彻执行让凉山的政治、经济、社会事业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口述者阿什老轨是凉山彝族地区出生，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成长起来的彝族领导干部。历任乡镇干部、普格县县委书记、凉山州委副书记、凉山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他不仅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受益者，也是党的民族政策在凉山的实践者和发扬者。2018年5月2日，州史志办工作人员在阿什老轨办公室对其进行了面对面访谈，他准备非常充分，全面回顾了党的民族政策为凉山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改革开放前，党的民族政策在凉山的实践

解放前，我们凉山被称为“荒凉之山”。由于历史、社会、地理、自然等各种因素，长期封闭、与世隔绝。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凉山彝族地区仍然停留在反动、黑暗、野蛮、残酷的奴隶社会，木里及冕宁、甘洛、越西等县的藏族地区停留在封建农奴社会，广大奴隶、娃子（没有自由、被奴隶主随意买卖的贫苦群体）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世代过着铁链缠身、刀耕火种、食不果腹、目不识丁、结绳记事的苦难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凉山。当时红军分别走的两条线，一条是走会理、德昌到西昌，在会理召开了会理会议。另外一条是何长工、罗炳辉带队走会东、宁南、普格，在西昌礼州与主力部队会师。在冕宁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之前彝海结盟的“彝”还是这个“夷”字，后来毛主席才改成“彝”，意思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有米吃、有丝穿。彝海结盟是党的民族政策在凉山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1952年10月1日，凉山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辖昭觉、美姑、布拖、普格、喜德、金阳、普雄七县。1956年，党领导凉山彝族人民开展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我把它称为“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的”，是因为它彻底摧毁了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度，自此世世代代当牛做马的奴隶娃子斩碎了束缚千年的铁锁链，第一次翻身做了主人；凉山成功实现了从黑暗的奴隶社会向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这就是凉山政治上的“一步跨千年”。

二、改革开放后，党的民族政策在凉山大放光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凉山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凉山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自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不断出台和完善，凉山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为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提供了法律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出来以后，我们根据凉山的实际情况，按照《宪法》和

阿什老轨穿上民族服饰擦尔瓦近照。

《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广泛征求了意见，才制定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试行以后，《民族区域自治法》又修改过，《自治条例》也有所修改。后来，根据自治条例又制定了配套的条例，比如《邛海保护条例》、《泸沽湖保护条例》、《彝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的制定都促进各领域的发展。我专门写了这方面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推动凉山地区经济社会向前发展，1978年党中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这个重大决策就是撤销西昌地区建制，将西昌地区所属西昌、德昌、会理、会东、宁南、冕宁、盐源、木里8县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州府从昭觉迁到西昌；原西昌地区管辖的盐边、米易两县划入攀枝花市，原凉山州管辖的马边县、峨边县划给乐山地区。我当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组织安排到西昌党校来学习。从成都请的教授给我们讲课。老师讲到："古时候，成都平原有彝族人，西昌也有彝族，诸葛亮和孟获交战，彝族人才跑到山上。现在党的政策好，解放后要摆脱贫困落后，要把彝族请回平原，让经济已经起步的西昌地区带动老凉山，摆脱贫困"。这是党中央对凉山发展的第二个重大政策。西凉合并后对原凉山彝族地区经济社会起到了很大带动作用。

第三个重大的政策就是中央决定建设"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2008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过建议。当时国家发改委给我回复：第一步将攀西资源带活，由四川省人民政府负责，成立攀西战略资源开发领导小组具体实施。2013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件设立"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这是党中央结合民族地区和攀西资源实际规划融合，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决策。

从民主改革到西凉合并，然后到攀西战略资源开发，再到后来党中央又将凉山彝族地区纳入乌蒙山片区扶贫开发，紧接着中央又推行了中西部融合扶贫，由广东省对凉山进行对口帮扶。最先是广东省珠海市对口凉山帮扶。后来广东省委书记来到凉山考察，感觉到扶贫力度小，珠海市力量薄弱，2016年换成了佛山市。当年就给凉山州11个贫困县每县1000万元资金搞农户安全住房建设，这个也是乌蒙山片区的政策。后来中央又推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制定"三区三州"政策，再一次把凉山纳入其中。"三区"指的是西藏、新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是指四川的凉山州、甘肃的临夏州、云南的怒江州，每年都有针对性的加大了投入和政策支持的力度。

党中央对凉山的政策支持力度是越来越大，因此凉山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凉山的农业彻底结束了刀耕火种历史，地方工业从无到有，交通、邮电通讯迅速发展，财政收入成倍的增长。凉山的工业已经形成了黑色、有色、卷烟、丝绸、制糖、建材、食品、皮革、造纸等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形成了十大优势产业，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我查过统计数据，1978年凉山地区生产总值为6.47亿元，到2017年已经达到1400多亿元。这就是政治翻身以后的经济变化，让我们的经济也实现了"一步跨千年"。

我要特别说一下改革开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关心下凉山民族教育的步步发展。从我自身来说，我的亲身体会就是民主改革以后，共产党从汉区（沿海发达地区）派来汉族教师、汉族医生，几乎覆盖每一个村，在农户家里手把手的教彝人写汉字，治

病，教育他们要讲卫生。当时我们就称他们“上海阿拉医生”“上海阿拉教师”（阿拉为上海方言，意为我、我们）。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加大了民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力度。省里也专门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四川省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制定“9+3”免费教育计划，2009年先在藏区施行，2014年这个计划正式在大小凉山彝区实施。这是四川省在国家十二五规划时期根据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出来的。实施彝区、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后，州内18所中职学校在校学生已经达到29554人，招录了8460名彝区、藏区“9+3”学生到内地优质中职学校就读。2010年省委推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计划时间是从2011年至2020年。州政府制定了《凉山州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凉山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加大了基础投入，除了中央的支持外，州委州政府也多渠道筹集资金，保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省、州、县四级都组织大规模培训中小学教师，凉山州已累计培训达12万人次。对11个贫困县农村教师给予了每人每月不低于400元的生活补贴，建设农村教师周转房7602套，农村教师队伍趋于稳定。强化了控辍保学工作，建立健全了控辍保学“六长”责任制，全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762300人，小学、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9.54%和93.17%。现在全州各县都实现了一村一幼，学前教育、初中、高中教育基本普及。彝族学子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的高校，有的已经走出国门。我记得2014年我们去欧美参观，就发现很多的海外彝族学子。凉山民族教育确确实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城里的彝族小孩都说普通话，我的普通话水平还很低（笑）。

为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党大力加强民族干部的培养。凉山刚刚解放的时候，共产党派了汉族知识分子到彝区教彝族孩子，三中全会前我们起来的这些民族干部，基本上都是他们教出来的。但我还是没有读完初中，因为遇到文革。后来党的九大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到农村大量的招干，每个村十几二十个的去，也不看文化，只要苗子好就输送，就这样参加了工作。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不断成长，凉山全州以彝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干部队伍逐步形成，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走上了工作岗位。在担任县委副书记以前，我都是靠自学的，不懂的就请教汉族老师、汉族干部，我考取了四川省委党校大专班，后来我取得大学本科文凭也是靠自学。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凉山人，生于1950年，从一个放牛的农村娃，共产党培养我，教育我怎样做人、怎样为人民，到后来任州人大主任，已经是了不得了，我同龄的人大都在农村。我就是党的民族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后来是实践者和发扬者。现在我68岁了，我还是这样认为，能够自己写点东西，自己写讲稿，这些都是归功于共产党培养教育的结果。

其次是在医疗上极大地解决了民族地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民族地区很多人都患有旧社会延续下来的病。三中全会后，中央对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改革加大投入，不断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现在农民全部加入新农合，农村人口看病能报销很大一部分，去异地看病也可以在本地报销。过去病了只能到县上州上，现在村上都有卫生院了，保障各族人民的健康，也保障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更进一步。现在是看病不要钱、读书不要钱。

第三是民族政策促进了凉山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民族政策保护民族的各种文化。古老的申请了非遗，比如毕摩（彝族中有知识的长者，是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文化。当时我到云南丽江参观，有一个“毕摩园”，创始人之前在美姑当过副县长。我回来之后写了一个建议给州委，说明彝族人没有宗教，毕摩文化不是封建迷信，是彝族人的信仰，是有关道德的文化。当时州委吴靖平书记看了并采纳了。他亲自到美姑县考察，之后州委就确定在美姑建一个“毕摩文化研究院”，很好的保存了彝族文化，这也是中央政策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的保护。当然“苏尼（彝族的巫师）”是迷信的，我是不相信的，毕摩就不一样了，他对彝族的语言文字的保存起到了很好的传承作用。还有彝族的“火把节”，现在已经是发扬光大，走向世界了。以前是小打小闹，以村

为单位，火把节第二天就斗牛、选美等。现在凉山的“火把节”已经叫“国际火把节”了，每年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来到凉山，对宣传凉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来的“邛海国际马拉松赛”，现在的“杜鹃花海”都是火把节的效应吸引来的。这就是彝族火把节文化的魅力。文化是魂、旅游是铁，魂铁结合相得益彰。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央和省的民族政策使凉山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效。由于历史、经济等等原因，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几百万凉山农民生活水平还处于温饱线以下。当年我当公社党委书记的时候吃返销粮、吃救济款。我去县上开会还说过：“我们要把吃返销粮、吃救济款的帽子摘掉，要走上生产自救的道路。”扶贫政策刚刚开始时，我在普格担任县委书记，全州有11个贫困县，普格也是其中之一。三中全会以后，贫困县戴起贫困帽子，国家有针对性的对贫困县给予资金、政策、项目、人才等支持。之前我说到，近年来中央、省委对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凉山均被纳入，中央、省委的领导也不断的来关怀凉山、支持凉山，凉山的扶贫工作成效很大。不单是物质上的扶贫，还有精神上的扶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现在国家又层层派了第一书记，各部门机关不断派人去驻村。如今在国家、省各项政策的关心支持下，全州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凉山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不和旧社会比较，就和三中全会之前比较，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到2020年肯定是要达到脱贫。2020年以后又如何巩固？习总书记提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所以到2020年脱贫之后还要更加继续发扬，这个我在北京也专门提过建议。

三、牢记习总书记嘱托，凉山各族人民继续感恩奋进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的十九大后民族地区调研的第一站安排在凉山，沿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路，亲切看望慰问彝区干部群众，视察指导工作，为彝区带来新春佳节的问候和祝福，带来了阳光和温暖，更是带来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温暖，我很荣幸受到总书记的接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下，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赢，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人民的美好生活，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豪迈宣言，为民族贫困地区打赢脱贫奔康这场硬仗增添了巨大的信心、无穷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来凉山考察，使凉山受到举国关注、全社会关心，为凉山更进一步争取国家政策的特殊支持，汇聚更多资源、更大力量、更强保障，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决胜脱贫攻坚、推进转型跨越，带来重大历史机遇。凉山各级干部群众深受鼓舞，信心满满。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扎扎实实、更加深入地把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读好，认真思考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为人民，感恩奋进、负重自强，满腔热情地干，马不停蹄地干，用实际行动、以实际成效，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民族政策书写在转型跨越、脱贫奔康的凉山大地上。

最后我想对我们的彝族同胞提一点期望。全国彝族现在已经有900多万了，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不少，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现在党中央民族政策那么好，我们一定要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衷心拥戴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永远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指引下搞好我们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像其他民族一样大有希望。

（采访：罗艳 整理：罗艳 陈迎东）

注重扶志扶智相结合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对脱贫攻坚关键年的思考

陈静

2020年是脱贫攻坚进入攻城拔寨、全面收官的紧要关头，是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最关键之年。2019年10月17日，在第六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①]深刻诠释了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通过脱贫攻坚的实施，使6000万贫困人口脱贫，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也为我们发起最后总攻、攻克最后堡垒坚定了信心决心。然而，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要实现困难群众可持续健康发展，不仅仅只是完成“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冲刺清零工作，更要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精准施策，全面发力，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在扶贫路上做到扶真贫、真扶贫，把脱贫的志气和致富的能力扶起来，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一、基本情况

自贡属于四川“四大片区”外典型的丘陵“插花式”贫困地区，贫困总量小，在2014年建档立卡时，共有113个贫困村、15.1万名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分布散，全市97.8%的村都有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全市贫困人口因病因残致贫占比达69.9%，整户无劳动力（或丧失劳动力）贫困人口占9.8%。[②]实施精准扶贫6年多来，各级党员干部苦干实干，奋力攻坚，不畏艰难，扶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减贫成效明显。2018年底113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5.1万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期减贫任务，为巩固提升、全面完成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二是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8万户贫困群众迁进新居，4万贫困人口实现就业，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8961元增加到去年底的17277元，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3029元增加到去年底的7140元。三是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问题普遍得到解决，53个贫困村成功建设为“美丽四川·宜居乡村”达标村和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我们在全面完成“两不愁三保障”任务的同时，还要对困难群众开展“回头看”，杜绝返贫情况发生。为实现困难群众小康路上可持续健康发展，还需要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提振生活信心，增强致富本领，激发内生动力，真正实现真脱贫、脱真贫，不返贫。

二、扶贫与扶志、扶智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③]看来，脱贫攻坚不仅仅只是完成“吃穿不愁三保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将扶志和扶智有机结合，精准发力，协同发展，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扶贫开发归根结底是要提升农户的综合素质，只有协同推进扶志、扶智帮扶工作，才能将外在的帮扶政策内化于农户主动发展的想法和能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扶志扶

智相结合”的重要性，强调了扶志扶智工作的必要性和长期性。所以，做好扶志、扶智工作关系到脱贫致富的根本改观和长远发展；扶志、扶智看似简单好做，实属难做不易，关乎到思想认识的积极进步和转变提升，只有思想认识发生了改变，才会激发人的内生动力。要进一步提高扶志、扶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大扶贫模式，加大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补齐扶志、扶智短板，全面做好整体脱贫攻坚工作。

三、扶志、扶智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在下派到沙罗村担任第一书记的两年间，经常与贫困户在一起，入户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和增收情况，了解他们的所需所盼，在交谈中发现扶志和扶智对帮扶贫困户的重要性以及存在不能共同推进、协同发展的一些问题和原因。

1、 对扶志扶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在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不能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 脱贫结果必须真实”，“脱贫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等等?，习总书记对扶贫工作有很多重要论述和讲话，提出了很多新的扶贫惠民政策和措施。扶贫工作根本体现了我们国家“消除贫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然而，在基层中对精准扶贫发展战略、政策措施、纪律规定及重大意义了解不全面、认识不深刻，大多数干部只重视表面上的“两不愁三保障”以及收入是否达标，对帮扶什么怎么帮扶等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对扶贫先扶志、必扶智认识不足，为了达标验收一味地想办法政策兜底，对扶志扶什么怎么做、扶智怎么办等方面缺少深入的思考。因此，需要在扶志、扶智方面提高认识，多想办法，多下功夫。

2、 对扶志扶智的作用发挥理解不深

“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要让贫困家庭孩子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起码学会一项有用的技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④]，习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这段话，特别强调了教育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要位置。在扶贫中发现，教育方面，农村教育质量明显落后，农村教师水平偏低，有些贫困孩子在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后选择辍学，甚至初中都没读完就外出打工的情况时有发生，没有机会接触高等教育；在医疗方面，贫困户就医大部分在乡镇卫生院，但那里的医疗设备相对落后，预防重大疾病意识不足，导致时常出现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发生；在就业方面，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以沙罗村为例，初中毕业人员占56%，小学毕业或读了些书的人员占42%，极少数人上过大学。所以大多只能从事较为辛苦的体力劳动，生存技能单一，一旦失业，很容易返贫。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困难群众受教育程度较低，思想滞后，更多着眼于给钱给物给好处，缺乏内生动力，依赖政府的思想严重。对扶智方面的劳动技能培训等也是漠然视之，对励志和“授渔”的扶志和“富智”的做法、作用和意义理解不深。

3、 产业扶贫需要扶志扶智

受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作用，农村引入第二、第三产业并不容易，只能依托现有的资源，扩大种植规模。农村产业主要以初级产品供应为主，深加工产品较少，在产业链上产品的附加值少，产量虽高但收益低，产业扶贫不能更好发挥对脱贫的实际作用。再加之，由于贫困户的文化和技术水平较低，对现代化产业的生产与产业链管理知识了解很少，给产业扶贫工作带来较大阻碍，使产业扶贫达不到预期效果。

四、推动扶志扶智工作举措

在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同时，只有扎实有效地做好扶志、扶智工作，让贫困群众拥有做人志

气、生活理想、致富目标，才能彻底改变贫困命运，摆脱贫困面貌，才能真正过上小康的幸福生活。

1、 注重在扶贫政策宣传上下功夫

习总书记强调：在扶贫攻坚的战场上，基层干部要在宣传政策上发挥关键作用。可以通过“村村响”喇叭、盐都先锋、学习强国、报纸、微信、电视等宣传载体，开辟扶贫故事专栏，树立脱贫先进典型，扩大脱贫政策和精神扶贫新观念的宣传范围。同时，要多与困难群众交流，多入户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想，宣传党的扶贫政策、惠民措施，让困难群众真正懂得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

2、 注重在重视教育上下功夫

习总书记强调：西部地区要彻底拔掉穷根，必须把教育作为管长远的事业抓好。[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和文明进步，终究是重视教育、发展教育、振兴教育的结果。一个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实现长远发展和发家致富同样靠重视和接受教育，特别要重视青少年的教育。通过思想动员、教育励志、启迪心智、重教促学，极力提高贫困群众对教育重要性的认知程度，不仅让贫困群众真正懂得“知识改变命运”、致富先“富智”的道理，更要让贫困家庭重视自己下一代的教育，保证其学龄子女全部入学接受教育。唯有这样，才能阻断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才能彻底改变贫困面貌，彻底摆脱穷苦命运，真正实现脱贫致富。

3、 注重在致富门路上下功夫

“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搞运动、一阵风，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这是习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在扶贫中，我们要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要求，对所在贫困家庭的基本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做到全面摸清家底，心中有数。通过思想引导、开拓视野、激发动力、励志创业，引导贫困群众对自己种什么、养什么、干什么的问题搞清楚；帮助他们在有没有干劲、能不能干成、带不带来效益的问题上想明白。在帮扶解决贫困群众当前实际困难的同时，帮助他们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着眼长远，谋划未来，积极主动接受先进思想，重视子女教育，学习科学知识，掌握技术本领，切实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门路，实现真正的脱贫致富。

4、 注重在树立贫困群众的自信心上下功夫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贫穷不是不可改变的宿命。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必先扶志。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习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而在扶贫中发现，一些贫困群众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和自身能力的局限，尽管努力奋斗但依然贫困；一些贫困群众习惯了长期的贫困生活，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干劲不足；一些贫困群众更是被多年的穷苦命运和艰难岁月压垮了挺起的脊梁、磨掉了奋斗的志气。我们要通过引导教育他们，树立做人志气，提振对生活的信心，帮助他们启迪心灵智慧，增强勤劳致富信念，激发他们脱贫的干劲和决心，激励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正处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只要贫困群众信念坚定，信心十足，抓住机遇，苦干实干，就一定能摆脱贫困命运，改变贫困面貌，过上幸福小康生活。

（作者单位：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①《迈向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未来》，《人民日报》2019年10月18日；

② 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20日；

③ 习近平在甘肃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响鼓重锤；

④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所。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33；

⑤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20日

一心向党经风云

——百岁女红军黄海云

王友平

2019年3月20日，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黄海云于广州不幸病逝，享年101岁。灵堂挽联写道："三过草地长征路上坚强小战士；百岁寿星人生途中幸福老母亲。"黄海云有着一段颇具传奇、令人敬佩的革命经历，她曾身经百战、历经磨难，见证了中国百年历史变迁、世纪风云变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流浪女童工参加红军

黄海云，1918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上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她本姓吴，家人给她取了个小名叫"秀娃"。她4岁时，父亲因为丢了地主家一头牛被抓进监狱，关了三天后不明不白地死去。原来家里为赎父亲出狱，变卖了田地，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母亲无力抚养四个孩子，迫不得已只好将最小的女儿送给镇上一个姓黄的人家做养女，从此"秀娃"改名"黄海云"。养父母靠放高利贷为生，经济还算宽裕，对她还不错，8岁时就送她去学堂里读书。她14岁时，养母病故，养父续弦，后母对她很不好，让她辍学在家，一天到晚也没什么好脸色。黄海云受不了这个气，15岁时她就在姐姐的帮助下来到了县城一家纺织厂当学徒做童工。她总是起早摸黑，每天至少要干活十二三个小时。不久因工厂在战乱中停产了，黄海云开始四处流浪。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来到梓潼县。当时黄海云和姐姐、嫂子们逃到了离县城几十里外的乡下姨妈家。在姨妈家，表姐动员她去见"同志哥"（红军），告诉她红军曾在自己的婆家住过，对人可好了；"红军是农民的军队，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黄海云曾躲在菜地里亲眼看到几个红军战士，他们打着绑腿、穿着草鞋、戴着帽子，个个精神抖擞，彬彬有礼。于是，她决定跟"同志哥"干革命去，便偷偷让表姐带她去报名参加红军。当时负责登记的红军干部简单问了她的家庭情况，反复看了她的身高，当时她身高只有1.48米，红军干部怕这小姑娘谎报年龄不想要她。但她决心了当红军，硬是左缠右磨，感动那位招兵干部，那位红军干部最终在报名登记册上写上了黄海云的名字，并发给她两条绑腿布，就算参加红军了。她高兴地立即回家取行李，可是姨妈却很舍不得，不让她走，她决心要走，最终说服了姨妈放行。临走时，姨父还给了她两块大洋，并叮嘱她说"如果干不了就赶紧回来"。她毅然决然地走了，这一走就是20多年。红军部队领导最初分配她到"新剧团"。黄海云不愿意去"演戏"，她宁可到运输队当苦力，于是被分配到了红军运输队。

"我也要做党的人！"

一开始，黄海云被编到运输队，她和战士们一起运送枪支弹药、粮食、伤员。运输队没车缺马，主要靠肩挑背扛。有一次，黄海云给部队运送枪

支，一杆枪有十多斤重，她人还没有枪高，一次就要背4条枪。老兵告诉她，枪是红军的命，丢了枪就等于丢了命。于是她视枪如命，白天把枪扛在肩上，晚上把枪垫在身下睡觉。有次碰到下冰雹，她生怕那鸡蛋大的冰雹把枪砸坏了，紧紧地把枪搂在怀里。一阵冰雹过后，枪是安然无恙，她头上却鼓起了好几个大包。在运输队，她经常要长途跋涉去完成任务，翻山越岭，往往一走就是几十里上百里。

几个月后，她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七分院当护士。医院不是战斗部队，护士都没配枪，若遇敌情，只能赶快找石头、木棒等防身击敌。当时，红军医院条件很差，缺医少药，当护士所做的工作就是帮伤病员煮点汤喝，换换纱布，不用打针也不用量血压，根本没有那些设备。但因条件太差，护士只能用消过毒的牛皮纸给伤员敷药，由于纸很硬，一贴上伤口，伤员总是痛得直叫。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黄海云换药时动作轻而且特别仔细。每到宿营地，护士们还要四处打柴，帮伤病员煮汤、烧洗脚水。黄海云个子小，每次出去，别人打一大捆，她只能打一小捆，可她从来不偷懒，总是格外努力工作，还怕红军会因为她的养父母成分不好而哪天会不要她。

黄海云所在的护士班总共十来个人。她发现班里有几个大姐平时工作非常积极，还经常在一起开会。黄海云去问为什么，大姐们告诉她，她们是“党的人”。“我也要做党的人！”黄海云说。

此后，黄海云工作更加积极，累活、脏活，不等分配，她总是抢着干。班里最累的活是抬伤员，大姐姐们看黄海云年纪小没安排她，可她总是争着上。有一次，她和一个姐妹抬着伤员一口气跑了好几公里，担架的扶手把她的肩膀磨得血肉模糊，衣服和皮肉都粘在了一起，疼得她直掉眼泪，但她却没叫一声苦。还有一次背粮食，黄海云背了五六十斤重的粮食，跟大姐姐们一起从山间小道回宿营地，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下半夜到达目的地时，她的衣服都成了布条条，身上布满血口子，到处青一块紫一块，她也一声不吭。

长征路上历艰险

1935年春，黄海云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行军异常艰难。她跟随红军翻越了两座大雪山。第一座是夹金山，第二座是党岭山。

1999年，八旬老红军黄海云在井冈山红军医院留影。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后西进甘孜，途中翻越党岭山。党岭山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西北，因系传说中古代羌人南迁时党项羌在此经过之地故名。党岭山海拔5000多米，异常险峻，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被称为“鬼门关”。翻越此山，需要上山下山各走一百里。黄海云和众多战士们一样，上身裹着两三件单衣，下身穿一条齐膝的短裤，打着绑腿，蹬着草鞋，拄着一根木棍。半路上，黄海云捡到一件粗线织的破背心，如获至宝，赶紧将它紧紧地绑在身上。一路上，黄海云和战友们相互搀扶着在风雪中艰难爬行，不时看到倒下冻僵的战友的尸骸。很多战士脚都冻裂了，长长的血口子，不时往外渗血。逼近山顶，寒风凛冽，战士们被刮得东倒西歪。山越来越陡，雪越积越厚，风越刮越紧，呼吸越来越困难，头晕脚软。战士们倘若在山上停下来休息、说话或喝雪水，很可能就倒下去再也起不来。接近山顶时，黄海云实在挪不动脚步，很想停下来喘口气，立即被战友们制止了。下山的时候，黄海云只好眼睛一闭，向下滚。有一次，她差点掉进冰洞里，多亏了手中那根结实的木棍救了她的命。双手麻木的黄海云死死攥着那根木棍，一步一步将雪山抛在了身后。黄海云后来回忆说：“我拄着木棍，手冷得发抖，一边还扶着战友，就这样忍着、撑着。直到后来下了雪山，我才庆幸自己还活着。”

1938年，黄海云与赖春风在延安合影。

1935年8月，中央军委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迅速过草地。红四方面军是第一次过草地。草地纵横百里、荒无人烟，到处是深不可测的险恶泥沼，一不留神就会连人带马被吞噬。草地上气候变幻无常，白天往往先还是万里无云、骄阳似火，一转眼就是乌云满天、瓢泼大雨，甚至还有雪花、冰雹，劈头盖脸砸来，让人躲也无处躲。那时大家都没有衣服换，也没有地方睡觉，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行军。更严重的是缺少粮食，随身背的干粮很快就吃光了，只好挖野菜、嚼草根。大家都担心掉队，一旦掉队，就意味着死亡。缺吃少穿、精疲力竭的红军将士，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背靠背休息一会儿。有一次，当黄海云从草地上站起时，发现背靠着自己的姐妹断了气，身子已经凉了。一路上，黄海云亲眼看见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

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活着走出草地。谁知张国焘又下令刚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重新穿过草地去攻打成都，张国焘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黄海云曾回忆说：“最难忘的莫过于过草地了。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竟然三过草地，令红军将士吃尽了苦头。”

二过草地，粮食奇缺。大家本来指望路上挖点野菜，可是红军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野菜就被挖光了。带的一点干粮很快吃完了，没等走完草地，就没得吃的了。很多人病死、冻死、饿死。幸亏前面的部队给黄海云所在的医院送来一头牛，全院每人分到巴掌大一块牛皮和四两牛肉。实在饿得撑不住了，黄海云就把牛皮拿出来，撕一小块放在嘴里，边走边嚼，牛皮很难嚼烂，最后干脆直接囫囵吞下了。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南下攻打成都失败，部队又决定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仍要穿越草地，这

就是第三次过草地。这次过草地与前两次的线路不同，行程也更远。开始，黄海云穿着草鞋在泥沼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艰难行进，一双草鞋不到两天就烂了。走到后来，带的草鞋穿完了，她就从破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来裹在脚上。但是裹在脚上的这块布，也很快被泥沼吞没。战友们只好将一块牛皮戳上几个洞，用绳子系在她脚上当鞋子。这双鞋看起来结实，可是一见水就滑溜溜的，一走就摔跤。后来黄海云干脆打着赤脚行军。走出草地时，她和其他战友一样，脚都被泡烂了。

回忆起长征时的艰难情景，黄海云心情沉重，她十分感叹地说："对女红军来说，雪山草地尤其残酷，环境差、营养差，女性还要面对生理期的问题。我是个护士，一路上烧汤煲药，但在过草地时，别说给伤病员治病，就是煮一碗汤给伤病员喝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因为缺衣少食，缺医没药，有时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在自己面前。那种揪心的场面，令人永世难忘啊！"

"革命不成功，誓不把家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到达甘肃，红军部队后勤部召集女兵开会，宣布"国共两党合作，部队不需要那么多女兵，医院要解散"，让女红军们各自回家去。一听这消息，女红军们顿时哭成一片，家在哪儿呀？"离家这么远，让我们往哪里摸呀？"黄海云不想回家，她找到后勤部长杨志诚请求道："我是出来干革命的，革命还没成功，就是枪毙我，我也不回家，死也不离开红军。"杨部长没办法，只好同意她留下，分配到兵站继续当护士。就这样，她跟着红军一路走到了延安。在延安，她被编入护士连，因为识字，又被选送到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学习，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党校进修。1936年，刚满18岁的黄海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校学习期间，黄海云认识了也同样参加了长征、从井冈山走来的25岁的红军战士赖春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38年他俩在延安结婚。

1960年代初，黄海云和丈夫赖春风少将合影　赖亚力供图。

婚后他俩一共生了六个孩子，由于战争形势所迫，不得不把其中两个女儿送给了乡亲抚养，后来一直杳无音信，这成了她终身的锥心之疼。1939年，她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教导营文书，不久进入延安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1941年春，随丈夫赖春风到甘肃陇东军分区，任统计参谋。1946年，任邯郸解放区组织部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福利科科长等职。1960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后以正师职身份离休。根据她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做的突出贡献，先后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各一枚。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上世纪60年代初，黄海云终于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老家梓潼探望父老乡亲。当时有人认为她是老红军，回家乡应通知县里，县里肯定会出面接待的。但黄海云为了不麻烦组织，就一人悄悄回家看了看姐姐哥哥。1982年，黄海云与老伴赖春风将军一起再次回到梓潼，仍然没有惊动县里。

终身宣传、弘扬长征精神

黄海云一生不忘长征情结，长期坚持宣传长征精神。1960年，黄海云被广州八一小学聘请为校外辅导员，常去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她也常给新战

士讲长征故事。黄海云说："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苦，我多讲一点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今天的生活需要珍惜，遇见困难也不要气馁。"直到晚年老红军黄海云还经常给人们讲长征故事。

2004年3月，黄海云在家里接受《解放军报》记者采访时，她回忆长征说道："最难忘的莫过于过草地了……第一次过草地是跟红一方面军会合，在百川、甘孜、炉霍一带，张国焘跟党中央闹分裂，要返回去打成都，成都没打成又返回来。结果把大家折腾得筋疲力尽。……当时掉队的、开小差的很多，也有很多人病死、冻死、饿死了。后来实在坚持不住，部队就杀了牛，每人分得巴掌大一块牛皮。这时我们已饿了两天，吃了牛皮第二天就没东西吃，不吃吧，又实在饿得难受。于是，大家把仅有的这点食物煮熟后，一次吃上一点点。正是靠着这一块牛皮和跟着红军干革命的坚定信念，我们终于走出了沼泽地。直到走到甘肃后，部队才搞到些粮食。"谈到现在的美好的物质生活，她说："我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不能忘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2006年9月，88岁的黄海云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感叹说："现在的和平、幸福来之不易。年轻人对红军长征越是没什么概念了。我要把过去那段历史讲给大家听，要让年轻一代不要忘本，不要忘记历史啊！"她详细回顾了长征的艰苦卓绝历程，不无幽默地说："现在有人开玩笑，说老红军这么长寿，当时过草地吃的是冬虫夏草吧？我那时没听说过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不是长在草地上的。"10月，广东省十佳少年张梦娴和《少先队员》杂志社的小记者们来到黄海云家慰问并请她讲红军长征故事，讲述结束后，黄海云和少先队员一同齐声朗诵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并愉快地合影留念。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突如其来的灾难消息传到了广州白云山脚下的一座小院里，已经90岁高龄的老红军黄海云每天守在电视机前，时常老泪纵横。"这个地方离我老家不太远。"老人家对身边的人说，"长征的时候，我在那里住过一阵子。"她从自己的退休金存折里拿出了仅有的两万元，捐给了地震灾区。

2006年10月19日，广东省十佳少年张梦娴和《少先队员》杂志社的小记者们采访老红军黄海云 赖亚力供图。

2009年，黄海云应邀参加广州军区司政后干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会。会上她声情并茂地讲述长征经历。她这样讲道：“我今年91岁，17岁参加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三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满头白发的老红军黄海云的授课，极大地引发了年轻干部战士们“寻找老红军，寻找红军传统”的热情。

为了宣传弘扬红军长征精神，凡是有单位要采访，她从不拒绝。有时身体不舒服，子女们劝她别接受采访了，可她说这是宣传红军长征精神的好机会，我不能放弃。就这样，她先后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解放军画报、井冈山干部学院和延安长征干部学院等采访。

2016年7月6日，中央电视台13台采访老红军黄海云 赖亚力供图。

2016年8月，黄海云高烧住院，她的女儿赖亚力还听到她在梦中讲长征：“那个高原，现在谁能上啊？”她98岁高龄时，还在家中给来看她的后辈和外国友人讲述长征故事。同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黄海云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黄海云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挫折，但她都能够坦然面对。她说：“人一旦有了理想信念，什么沟沟坎坎都能过得去。”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伟大的长征精神支撑和激励了长征女战士黄海云的一生，也通过她的不懈宣传和终身践行弘扬感染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年轻后代。

黄海云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历经风云，创造辉煌，活得精彩。她与赖春风将军都非常重视家风，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她那种自强自立、坚韧不拔、奋斗不息的精神，那种打不垮、拖不烂、能扛住任何压力的巨大能量，那种善良、宽厚、慈祥、体贴的胸怀和爱心，深深地影响着她的子孙后代。她总是极力关心别人，除了自己家的孩子，对老战友们的孩子，她也时常挂在心上，总想为他们的成长多做一些事情；对老伴的老家井冈山和自己四川老家也关怀备至，她带领子女们为家乡的建设集资募捐，在井冈山建了一所希望学校——春风中学，为老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2019年11月9日，老红军黄海云骨灰安放仪式在井冈山根据地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实现了她魂归井冈的夙愿。

这位一心向着党和人民、历经革命风云沧桑的百岁女红军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精神品质将永远激励着国人，正如一首挽诗所写：

“巾帼少小入红军，百战强敌泣鬼神。
救苦英豪今逝世，精神不死励国人。”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老红军黄海云之女赖亚力女士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加快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江红颖

新冠疫情大流行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甚至引发衰退。但疫情过后，受疫情重创的国家必然把重振经济摆上日程，从这个角度看，严重的疫情蕴藏着世界经济格局重构的契机，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丘吉尔曾说，我们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因此，化危为机，下好发展“先手棋"，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一、疫情加剧、原油暴跌、股市暴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严重

1、疫情加剧，引发世界资本市场剧烈震荡

在疫情、需求锐减、沙特与俄罗斯不愿石油减产的合力作用下，3月18日布伦特原油跌破27美元/桶。原油暴跌，导致投资者对世界经济预期的悲观，引发主要经济体股市暴跌，美股短期四次熔断，道指从2月12日摸高29568点到3月23日一度跌到18341点。

2、石油价格暴跌沉重打击美元霸权

石油暴跌打击的不仅是美国石油产业，更是严重打击石油美元。3月16日，美联储推出“降息至零+量化宽松”对策，随后美国政府宣布考虑推出涉及超过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为美国经济下滑

风险踩“急刹车”，其核心目的在于------维护建立在石油美元基础上的美元霸权地位。

3、世界经济格局或许面临转折关口

继美国之后，欧洲央行、日本等国相继推出巨额资金的刺激方案。主要经济体的罕见举动，警示世界经济下滑风险的严重程度，揭示世界经济格局的转折关口或许就在当下，我们需要高度关注。

二、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战疫胜利在望，中国经济将进入发展新阶段，出现若干新特点，需要科学认识，正确应对。

1、我国经济基本面向好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并存

新冠疫情虽然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冲击，但我国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挑战与机遇并存。

2、国际经济形势溢出风险，加大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从产业链看，疫情加剧，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加大，制造业放缓，供应链短期中断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很大冲击，同时，国内产业链也存在外移风险。

3、疫情持续，国际市场呈现结构性变化趋势

从需求端看，国际市场订单减少，毁约增多，不少国内企业困难加大甚至濒临破产。同时，与抗疫相关的医卫药械需求和出口出现阶段性上升，又为相关产业带来发展机遇；疫情也为落后产能的淘汰构成外在压力，成为结构优化的契机。我们应努力减轻痛苦指数，实现平稳过渡。

4、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

从供给端看，中国已成为世界供应链中最重要的一环，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疫情过后，中国制造业的恢复生产，可望对冲国际市场份额的部分损失，在客观上促使相关行业的价值链升级和创新，提升中国在世界价值链重构中的话语权。

5、内需的巨大潜力，强力推动中国制造业持续成长

从国内市场看，我国已成为世界市场大国，大进大出+内需市场的经济格局，决定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绝不会因疫情而撼动，它将强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的持续成长。因疫情而积压的消费将在疫情过后强劲释放，甚至出现报复性增长。疫情还催生了新行业新业态的发展机遇，相关产业的发展将会迎来加速发展。

6、中国率先结束疫情，赢得珍贵的发展时间差

从时间窗口看，我国疫情发生在前，得到控制和结束在前，生产秩序恢复在前。而世界主要经济体疫情发生时间在后，目前尚陷泥潭中，结束时日难料，其生产秩序恢复比我国至少晚几个月。兵贵神速，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时间差就是市场，就是机遇。我国率先启动恢复键抢得市场先机，这是中国经济损失回补和发展的关键，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没有理由不用好。

三、对恢复经济发展的建议

为更好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我们建议：把刺激消费端放在恢复经济发展举措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此扩大内需，引导供给端企业发展。具体是：

1、实施消费减税试点，引导供给端企业发展

没有订单，企业生产就失去意义，更谈不上

发展。为刺激消费、扩大市场，省内外不少地方试点推出不同形式的消费券，这种办法相对容易操作。但实施消费减税，把刺激消费端放在恢复经济发展举措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可作为在减免税收，降低企业用能成本之外等直接扶持生产企业措施的另一种选择。

动态地阶段性实行消费减税试点，消费者发生消费行为即享受部分支付抵扣，将国家征收的消费税部分返还消费者。实施消费减税，可以减轻消费者负担，增强消费意愿，引导消费指向；对商贸企业来说，可以带动营业额度增长，增加经营利润；对生产企业来说，可以放大国内市场容量，消化企业产能；还可以提高电子支付比例，增强纳税意识。把对生产端的减税让利调整为对消费端的减税，可以激发消费潜力，产生消费乘数效应，增加内需，最终实现对供给端企业更有效的良性刺激。

2、阶段性发放定向旅游消费券，刺激国内游

旅游业是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本身又是涉及面广、就业面宽、带动性强的行业，应予重点支持。中国是世界最大旅游客源国，因疫情受到抑制的旅游需求将在疫情过后强劲恢复，国外游的萎缩将是大概率事件。为此，可在旅游业实施阶段性发放定向消费券，引导国内居民旅游改变偏好，引导庞大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能量转向国内游，升级国内游消费，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3、人员产能走出去，参与重灾国家疫后经济重振

在疫情大流行的关键时刻，中国向世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体现了大国担当，赢得众多国家的尊重和民众的认同，这也是中国走出去的极好宣传推介。

疫情结束后，重灾国家和地区将把经济重振摆上日程。疫后经济重振在重灾国家和地区的实施，有如二战结束后“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实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意义重大，这是我们走出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难得契机。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提前统筹谋划，为疫情过后人员走出去，产能走出去做准备，为参与重灾国家疫后经济重振做准备。要重点推出一批类似“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政策举措，努力推进于我有利的世界产业链布局进程。

4、资本走出去，实现共建共享共发展

把握疫情带来的世界产业链重构契机，透过亚投行和第三方合作等方式，加强与疫情重灾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合作，为其经济重振提供流动性，推动资本走出去，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发展。

突如其来的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一方面，重灾国家和地区疫后经济重振急需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各国也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基于对我国出手援助疫情的认同和经济重振的迫切需要，相关国家和地区对资本审查、项目审查和敏感性技术审查会展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这是我国企业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建设投资、企业并购、股权增持的极好机会。我们要充分利用难得的机遇，提高人民币结算的比例，逐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实现走出去利益的最大化。

5、绝不放松农业生产，确保粮食安全

农业生产受诸多自然因素制约，疫情持续为全球粮食生产和粮食供应链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国际粮食出口总量减少和市场价格上涨均存在较大可能。民以食为天，因疫情有的国家民众已出现囤积食品。一方面，美国极力向我国推销农产品，另一方面，如果疫情严重影响农业，粮食也会成为大国博弈的武器。

在疫情全球大流动的情况下，加强农业生产也就更加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我们在着力恢复工业发展的同时，绝对不能放松农业生产，必须确保夏秋粮食丰收，适度增加小麦、大豆、玉米等重要农产品的战略储备，确保粮食安全，始终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作者单位：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壮丽70年(连载):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四川印记》(四)

第五十一集

《财富》全球论坛在成都举行

2013年6月，第12届《财富》全球论坛在成都举行。

此次论坛主题是“中国的新未来”，中心议题包括中国世纪、资源解决方案、创新与技术、全球金融与经济复苏。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这次盛会是继1999年在上海、2001年在香港和2005年在北京举办后第四次落户中国，也是该论坛首次落户中国西部城市。通过此次论坛，成都向世界充分展示了“财富之城、成功之都”的国际形象。

作为全球经济“风向标”的财富全球论坛落户成都，充分反映了成都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在全面建设开放型区域中心和国际化城市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近年来，成都着眼高远，持续用力，认真落实《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切实增强西部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通信枢纽“五中心一枢纽”支撑功能。先后承办了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第十八届世警会等重大国际性盛会。

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新认为：《财富》全球论坛等重大国际性活动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提升了成都在中国乃至全球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成都强化在国家开放全局中的节点地位和枢纽功能，持续推进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走出了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新路。（宣教文献处 范 斌）

第五十二集

稻城亚丁机场正式通航

2013年9月16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稻城亚丁机场正式通航。

稻城亚丁机场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北部，海拔高度4411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

机场。该机场于2011年4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立项，2012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2013年9月正式通航。这是甘孜州境内继2008年10月通航的康定机场后的第二个机场，对迅速改善民族地区落后的交通状况，促进当地旅游和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加强国防建设有着重要意义。2019年9月16日，甘孜格萨尔机场正式建成通航。甘孜州成为四川省唯一一个拥有三个民用支线机场的市（州）。

近年来，四川大力推进机场建设，一方面全力打造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各地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建设。2016年5月，我国“十三五”规划新建最大的机场项目——天府国际机场开工建设，为四川乃至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提供了新动能。机场建成后，成都将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中国内陆第三个拥有两座大型枢纽机场的城市，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将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支线机场方面，阆中机场、乐山机场将很快开工建设，到2025年全省通航和在建的民用运输机场将达到22个，列全国第五。全省干线机场、支线机场、通用机场共同构成了“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层次分明、安全高效”的网络体系。

四川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兼基础产业处处长杜义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四川民航发展取得显著成果，机场布局日趋完善，航线网络持续加密，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支撑能力持续增强。15个民用运输机场，121条国际（地区）航线，有力地推进了我省对外开放合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宣教文献处 马 睿）

第五十三集

首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举办

2013年10月，首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在绵阳举办。

2013年10月，首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在绵阳举办。科博会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科技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博览盛会，重点展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以及成果转化对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每年定期在绵阳举办，至今已成功连续举办七届。

科博会定点举办地——中国绵阳科技城，是在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建设起来的中国唯一科技城。2000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绵阳科技城的重要战略决策。2001年7月，国务院批复《绵阳科技城发展纲要》。2007年7月，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绵阳科技城党工委、管委会。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对科技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6月，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对科技城建设作出部署；今年3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中国（绵阳）科技城加快发展的意见》。今年1-6月，科技城实现GDP871.08亿元、增长9.5%。

中国（绵阳）科技城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胡国洪认为：科博会日益将科技城推向了世界科技创新的前沿舞台和汇入了世界科技创新的时代潮流。科技城从建设到实现“五个新”、到建设“五个地”，再到打造创新驱动发展的试验田、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等，使命任务不断升级，为推动产业发展、助力经济增长、保障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宣教文献处 蒲志明）

第五十四集

国务院批复建设国家级新区——四川天府新区

2014年10月，国务院批复建设国家级新区——四川天府新区。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设立四川天府新区的批复》，四川天府新区正式成为国家级新区。新区区域范围涉及成都、眉山、资阳三市所辖7县（市、区），规划面积1578平方公里。

五年来，省委、省政府把建设天府新区作为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建设成渝经济区、打造四川新兴增长极的重大战略举措。2014年11月，省委、省政府印发《四川天府新区总体方案》；12月，省

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四川天府新区建设的指导意见》。2015年11月，省政府批复同意《四川天府新区总体建设规划（2010-2030）》。2017年11月，省委、省政府成立天府新区建设领导小组，省长兼任组长。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府新区时指出“天府新区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天府新区已初步形成组群布局、生态宜居的城市格局和高端引领、绿色低碳的产业雏形，累计完成GDP1.18万亿元，经济总量位居19个国家级新区第5位，已成为四川乃至西部的“靓丽名片”，成为四川面向全球配置高端要素的“重大平台”，成为引领区域协同、全域开放的“新标杆”。

天府新区总规划师、同济大学教授匡晓明表示：天府新区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遵循总书记量身确定的“一点一园一极一地”战略定位和重大要求，抢抓省委省政府新一轮加快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全面推进“二次创业”，全力打造新时代公园城市典范和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宣教文献处 马 睿）

第五十五集
四川印发《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

2013年12月，省委印发《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提出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治。

随后，省委成立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全面推动依法治省发展改革进程。2014年5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深入推进依法治省的决议》。同年9月，省委办公厅印发《四川省依法治省指标体系》，这种以指标的形式整体推进依法治省工作的做法，在国内尚属首创。同年11月，省委十届五次全会通过《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省的决定》。

2015年3月，中国首部区域法治蓝皮书——《四川法治蓝皮书·四川依法治省年度报告》在北京发布。同年7月，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省工作落实的意见》，同时颁布实施《四川省依法治省评价标准》和《四川省法治建设状况评估办法》。至此，四川省依法治省宏观架构体系全面形成。

2016年1月，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2018年，省委将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改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

四川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办副主任、司法厅副厅长王彬认为：《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为推进依法治省提供了行动指南。四川省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的落地落实，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治蜀兴川各项事业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宣教文献处 王 强）

第五十六集
省委全会专题研究部署扶贫开发工作

2015年7月，省委全会专题研究部署扶贫开发工作。

2015年7月，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确立了我省扶贫开发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为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制定了时间表、路线图。首次以全会形式专题研究部署扶贫开发工作，四川在全国开创了先河。

近年来，四川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高位推进各项工作。持续加强“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五级书记一起抓”的脱贫攻坚工作格局，全面落实“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机制。出台《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等系列重要文件，形成“3+10+N”组合拳。建成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实施“五个一批”行动计划。聚焦难点，把彝区藏区45个深度贫困县作为重中之重。选派省直机关干部到“四大片区”任职，实现11501个贫困村“五个一”帮扶全覆盖。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大凉山腹地考察脱贫攻坚工作，为我省进一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6月，四川省综合帮扶凉山州打赢脱贫攻坚战动员大会召开，吹响了向凉山州深度贫困发起总攻的冲锋号。截至2018年底，全省贫困县总数降至38个，贫困村降至1782个，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减少到71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

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扶贫开发局局长降初认为：《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有力地推进了我省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作不断取得新胜利、开创新局面。四川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责任、最大民生工程、最大发展机遇，统筹协调，综合施策，走出了一条具有四川特色的路子。（宣教文献处 王治刚）

第五十七集

四川被列入国家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实验区

2015年8月，四川被列入全国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

2016年6月，国务院同意四川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先行先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四川扎实开展创新创造，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等试点任务精心组织好、实施好。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全面创新改革作为推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重要抓手。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面创新改革驱动转型发展的决定》，省委十一届二次、三次、四次全会对相关重大工作进行谋划部署，成立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全力推进8个方面43项改革举措，全面完成国务院授权的30项先行先试改革任务。同时，坚持“清单制+责任制”，滚动编制“9张清单”，建立省直相关部门与50家中央在川单位工作协调推进机制，编制“6本台账”。

2018年10月，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成都举行。在全国两次推广的36条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经验中，四川贡献了16条，居全国前列。2018年，四川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1.75万亿元，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6%。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三处三级调研员刘海燕认为：四川省在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进程中，探索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形成了一批推动创新发展的制度供给和政策体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有力推动了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战略支撑。（宣教文献处 范 斌）

≫ 省委党史研究室抓实抓细全方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省委党史研究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相关部署要求，在抓实抓细上下功夫，全方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疫情发生后，省委党史研究室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成立了以室主任刘晓晨为组长，副主任江红英、机关党委书记郭生春为副组长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对疫情防控工作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实施。要求各处室、各党支部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主动防控、科学防控、联动防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

2月3日、5日，室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相继印发《关于扎实做好室机关干部职工节后返岗上班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方案》，进一步健全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机制，确保疫情防控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死角”。一是加强办公区域防控，由办公室督促各处室严格落实省直机关办公区域管理防控工作指南，严格要求干部接受门卫每日晨检，安排人员每日对办公区域和重点部位进行消毒，对办公用具进行规范消毒处理，多人办公和进行工作接触时彼此佩戴口罩。二是关心关注重点对象，关注到省外特别是到疫情重点地区返川或接触过疫情重点地区对象的人员，居家观察14天，观察期间严禁与外界接触，防止失管失控。三是采取弹性办公制，疫情防控期间每天由室领导轮流代班，各处室人员采取在办公室办公与在家办公相结合的方式工作，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接触、流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工作正常推进“两手抓、两不误”。四是严格日报制度，各分管领导和各处室负责人严格执行防疫期间的日报制度，及时跟进关注重点对象和特殊情况，每天下午4时前向办公室报告个人和家庭成员情况。五是主动接受属地管理，全体干部职工自觉督促家属主动接受社区、住地网格化管理，积极配合相关工作，坚决杜绝群体性聚集、聚餐活动。六是切实加强自我防护，干部职工及家属务必减少外出，勤洗手、勤通风，个人用品要高温消毒处理，减少感染风险。七是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微信、QQ工作群、朋友圈、网站等媒体广泛宣传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理性认识疫情，不信谣、不传谣，全力做好本职工作。

≫ 70集系列专题片《四川印记》作品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1月21日，由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70集系列专题片《四川记忆》作品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局、省文联、省作协、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省党史学会、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专家30余人齐聚一堂，为党史工作与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共同谋划做好建党100周年相关庆祝活动，营造宣传学习党的历史、形成知史爱党的浓厚氛围等工作会诊把脉。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晓晨，四川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编辑杨颖，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江红英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郭生春主持研讨会。

70集系列专题片《四川印记》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广播电视台主创团队从四川党史研究成果资料中心、川台媒资库?、四川省音像资料馆等中精心挑选、梳理出四川70年的70个重大历史事件，精编文稿，优选视频，力求由点及线、由线及面铺陈展开，生动丰富地展现了四川70年的辉煌巨变。该片现已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新闻》栏目、学习强国APP等八大平台全部播完，截止目前，全网点击已突破两千万，获得了省内外、海内外广大观众网友的广泛好评。

≫ 遂宁党史资政报告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充分肯定和批示

近日，遂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紧紧围绕中央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重大决策，主动作为、积极谋划，紧密结合四川重庆推进举措，紧扣遂宁潼南两地经济社会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人文地理展开专题研究，组织精干力量撰写《关于党史工作服务“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快遂潼一体化发展“的“四个一“建议》资政报告，全面梳理了遂宁潼南两地历史建制渊源、人文地理根脉，厘清了党领导两地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深厚关联；着力党史工作服务“遂潼一体化”发展部署，提出了“建立一个红色场馆联盟、建设一个高端智库、举办一场高峰论坛和打造一个研究基地”的“四个一”建议。报告得到市委书记邵革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相洪、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鸿、副市长雷刚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批示，要求市发改委、市文广旅游局等部门会同党史部门认真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并抓紧落实推进。

≫ 内江市委书记马波对《从抗击非典到抗击新冠的内江实践》作出肯定性批示

2月21日，内江市委书记马波对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资政专报《从抗击非典到抗击新冠的内江实践》作出肯定性批示。同日，市委副书记余先河同志作出批示。《从抗击非典到抗击新冠的内江实践》一文，回顾总结了内江市抗击非典的历史经验，跟进分析了内江抗击新冠的实践路径，比较分析了内江抗击非典和新冠的应对举措，初步总结了内江市抗击非典和新冠获得的“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保证、人民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卫生事业是最基础的事业、健康产业是最民生的产业、治理能力是最有效的能力”等五个方面的有益启示，对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 绵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岳勇看望慰问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职工

2月3日上午，绵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岳勇看望慰问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职工，强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必须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抓好机关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采取灵活的办公方式，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确保干部职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维护机关正常的办公秩序。

≫ 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及时学习传达党中央、省委、市委有关防控部署，贯彻落实相关要求，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积极开展防控工作。

一是通过学习强国视频会议、微信群等方式，多次召开职工专题学习会议，让所有职工进一步明确防控内容，增强工作信心，增添工作动力。二是积极支持配合“双报到”社区开展防控工作，室主要领导带队先后到“双报到”的广安区广惠社区、望江社区赠送衣服消毒液、灭菌湿巾等抗击疫情急需物资，加强与社区沟通配合，与社区干部并肩战斗。三是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积极妥善推进扶贫攻坚工作。四是加强自我防控，避免受到感染。五是加强信息反馈，及时收集整编防控大事记，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研究抗疫历史，梳理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提供资政服务。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晓晨一行赴广安市开展驻村帮扶走访慰问及党史工作调研

广安区悦来镇方寨村是我室第一批精准脱贫联系点，已于2017年实现整村摘帽脱贫目标，悦来镇中合村是我室第二批精准脱贫联系点，已于2019年实现整村摘帽脱贫目标。

为落实省委开展春节前“走基层、送温暖”活动部署要求，1月15日，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晓晨带领办公室、党史一处、宣教处、机关党委部分党员干部赴广安区悦来镇中合村、方寨村开展驻村帮扶和春节前慰问工作，并送我室挂职中合村第一书记彭海到村党支部报到。

刘晓晨一行深入广安区悦来镇中合村、方寨村，实地查看村级阵地、基础设施、集体经济和产业发展情况，详细了解干部群众，特别是困难党员、困难群众和孤寡老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先后走访慰问村组干部、老党员、困难群众代表和结对帮扶对象，并送上慰问品、慰问金，带去全室干部职工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福。在中合村活动室，刘晓晨认真听取了“村两委”工作汇报和干部群众的踊跃发言，与大家座谈共商乡村振兴和致富奔康计划。在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刘晓晨强调：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和全面小康建成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关之年，大家一定要在区委、镇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及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紧密结合实际，广泛听取村民意见，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新机制，坚决杜绝“返贫”现象。要继续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领导和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开展“四好村”建设，探索创新“农民夜校”新形式，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不断提升农民实用技能，同时培育好农业产业后备人才和农村致富能手。要充分发挥村组优势，充分发挥本村15亩水池养鱼和500头湖羊党员扶贫工程示范效应，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脱贫。在实现摘帽脱贫目标的基础上，让全村群众增收致富，过上幸福生活，与全国人民一道迈步奔向全面小康。

在座谈会上，大家纷纷表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帮扶下，大家有信心、有决心实现致富奔康目标，不断创造更加美好和谐的新生活。

离开中合村时，刘晓晨还特意叮嘱第一书记彭海，要多向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在落地落细落实上下功夫；要尽快转变角色，尽快熟悉村情户情民情；要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积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带领群众共同奔康致富，为建设小平故里作贡献。

1月16日，刘晓晨一行参观了武胜县网上党史馆、红岩英雄文化陈列馆、武胜县党史馆等党史党性教育基地。刘晓晨指出，在大数据、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网上党史馆的建设既是抓好党史工作的重要平台，也是新时代发挥党史资政育人重要功能的迫切需要。希望武胜县充分整合党史资源，继续深入挖掘，进一步提档升级，更好地发挥示范作用。

（省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委 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供稿）

雅康高速公路大渡河特大桥